

狄考文在华活动研究  
A Study on Calvin.Mateer's  
Activities in China

(申请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

培 养 单 位 :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学 科 : 中国近现代史  
研 究 生 : 胡 凯 基  
指 导 教 师 : 董 士 伟 副 教 授

二〇〇六年六月

#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清华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清华大学拥有在著作权法规定范围内学位论文的使用权，其中包括：（1）已获学位的研究生必须按学校规定提交学位论文，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研究生上交的学位论文；（2）为教学和科研目的，学校可以将公开的学位论文作为资料在图书馆、资料室等场所供校内师生阅读，或在校园网上供校内师生浏览部分内容；（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向国家图书馆报送可以公开的学位论文。

本人保证遵守上述规定。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_\_\_\_\_

导师签名： \_\_\_\_\_

日 期： \_\_\_\_\_

日 期： \_\_\_\_\_

## 摘 要

本文研究清末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的在华以创办山东文会馆为主的活  
动。

“以学辅教”——开办教会学校是晚清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重要活动。  
本文的研究对象狄考文是传教士教育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李提摩太称其为“中  
国近代科学教育之父”。当代学者史静寰认为他是“十九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  
传教士教育家”。论文大致分两大部分。前面探讨了狄考文办学背景及起因，包  
括美国教会的社会地位和性质、狄考文所隶属的美国长老会的传教活动、美国的  
教育状况、狄考文的美国生活经历、狄考文办学时的中国教育状况、传教士对于  
教会学校的不同意见、中国官民对教会学校的态度、朱丽娅的首创、狄考文巡回  
布道的困境；后面探讨了狄考文的办学过程及其影响，包括文会馆的课程设置（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经学、英文、宗教）及其原因、学生课外活动、学校对社会  
的影响（毕业生、其他方面）。

本文重点分析了美国教会在其国内的社会地位、狄考文的基督教与自然科学  
互相促进的观点，并因此在教会学校里大力开设自然科学课程的举动、狄考文反  
对开设英文课程、用英文授课的原因和就此与其他人发生的争论。

总体来说，本文认为无论从狄考文办学背景及起因还是从其办学过程及影响  
上看，狄考文的在华活动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晚清美国来华传教士 狄考文 文会馆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on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Calvin Mateer's activities in China which is mainly his founding and managing the Wenhui College (Wenhuiguan).

“To assist mission with education enterprise”——founding and managing Missionary schools was an important activity of the Christi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Late Qing. Calvin Mateer whom this paper deals with is a typical character among the Missionary educationist. This paper is comprised of two parts. The former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cause of Mateer's founding the school, which includes American church's social position and nature, the activities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of which Mateer is a member, American education condition, Mateer's experience in America, the education condition in China when Mateer began to found his school, the missionaries' different opinions on missionaries' founding schools, Mateer's initiative, Mateer's unfruitful itineration; the latter part discusses the process and influence of Mateer's founding and managing the school, which includes the courses that Wenhui College offered and its cause, the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e school's (its graduates and the other sides) influence on society.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church's progressive social position, Mateer's opinion that Christian church and natural science promote each other, 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his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on natural science in his church school, Mateer's opposing setting English course, giving classes in English and his argument with others on this issue.

In short, this paper thinks that Mateer's activities were beneficial, doesn't agree with his backwardness and harmfulness. While, this paper thinks that Chinese must find their own causes despite the causes founded by foreigners in China such as the church schools during Late Qing period were beneficial which could be taken as advantages.

**Keywords:**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Late Qing

Mateer      Wenhui College



# 目 录

第1章 前 言 .....	1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
1.2 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	2
1.3 论文的基本框架 .....	7
1.4 狄考文生平及思想简介 .....	7
第2章 狄考文办学背景及起因 .....	9
2.1 美国状况 .....	9
2.2 中国状况 .....	14
2.3 直接办学起因 .....	17
第3章 办学过程及其影响 .....	20
3.1 课程设置及其原因 .....	20
3.2 学校对社会的影响 .....	36
3.3 狄考文在华其他活动 .....	42
主要参考文献 .....	45
致 谢 .....	50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1

# 第1章 前言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我高中时就读的蓬莱一中在校方网站上把学校历史追溯到 1864 年狄考文创办的登州文会馆；而与蓬莱一中一墙之隔的聋哑学校估计也和晚清时在登州的女传教士梅理士夫人创办的启喑学校有渊源；烟台地区最好的高中烟台二中前身是传教士创办的益文学校；烟台地区最好的医院毓皇顶医院在其大厅的院史介绍墙上标明医院由美国北长老会创建于 1908 年；闻名全国的烟台苹果、樱桃、花生当初得益于传教士的引进、改良……这些可以实实在在享受到的好处，是烟台的殖民主义耻辱还是烟台人民善于接受新事物、对外开放的成果？

这些问题促使我阅读了一些传教士传记、回忆录和一些这方面的论著，渐渐对传教士的社会活动问题发生了兴趣，希望在做毕业论文时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在渐渐加深对这个论题的了解过程中，发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很多，但评价则并不一致。清华大学历史系承担了清史工程的外国人列传部分，在我家乡蓬莱办了四十年（1864—1904）教育的狄考文牧师被列在初步选定的名单中。经与导师商量，我决定选择狄考文的在华活动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

### （二）选题价值

“以学辅教”——开办教会学校是晚清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重要活动。传教士开办教会学校的动机，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学、西学、宗教课的关系），学校的教科书选用，教会学校的现代教育体制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对后来官办新式学校的影响等一系列课题，已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本文的研究对象狄考文是传教士教育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李提摩太称其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父”<sup>①</sup>。当代学者史静寰认为他是“十九世纪后期最有名望和影响的传教士教育家”。<sup>②</sup>在实践上，他率先走上教会学校教育专业化的道路，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以 1882 年纽约长老会批准、承认为学院为计算日期，后来与其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London : T • F • Unwin Ltd • , 1916), p34.

<sup>②</sup>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珠海出版社，1998 年版，第 89 页。

他学校合并为山东基督教大学，又称齐鲁大学)。在课程设置上，一方面，他在 18 世纪六十年代即坚决进行西方自然科学教育（包括在当时相当先进和完备的实验），另一方面，他在二十世纪初仍反对开设英文课（这时上海圣约翰大学已经用英语教授除国文外的所有课程）。1877 年 5 月狄考文在“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届大会”上建议传教士编辑世俗教科书。大会决定成立“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直译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当时称“益智书会”）狄考文与丁韪良（任会长）、韦廉臣、林乐知、傅兰雅任该会委员，其所编著的《笔算数学》修订三次，共印 18 次，《形学备旨》修订三次，共印 16 次，为众多教会学校及洋务派学校采用。1890 年第二次大会决定将其改组扩大为“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即“中国教育会”，中文仍用“益智书会”名称，狄考文担任会长。狄考文在上海的两次传教士大会和山东的两次传教士大会及基督教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发言、在《万国公报》、《教务杂志》撰文阐述了自己的传教、教育思想理论。可以发现，狄考文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引领传教士教育活动潮流的一个人物。通过对狄考文的深入、全面研究，以“解剖麻雀”的态度尽量把狄考文的活动之“真”阐述出来，加以评述，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传教士教育活动的整体状况，也有可能对已有的对传教士教育家的一般评价有所丰富、发展。

在参考文献上，本文准备在一般研究者所用资料基础上，充分利用英文的传教士（狄考文、倪维思、郭显德、丁韪良）的回忆录、传记，教会的报告、记录及山东省、烟台市图书档案馆所藏地方文献。有一本 1997 年版的《广文校谱》为此前研究者所未征引。

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在中国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但一些传教士教育家能从七八个学生、一两位教师开始，创办发展起有相当规模、影响的学校，其办学经验、理念、方法对我们今天公私学校的创办、管理也许仍不无借鉴意义。

## 1.2 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 （一）对晚清传教士整体的研究

费正清曾指出“研究传教士是了解中美关系的主要钥匙”。<sup>①</sup>就我国来说，在 1949 年前，主要是一些信徒作了一些对传教给予肯定的简单研究，再就是从

---

<sup>①</sup> Fairbank: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Schorly resources inc,1986),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珠海出版社，1998 年版，导言第 17 页。

反帝的政治需要出发做的批判。

1949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对此研究很少，而且多是批判之作。一般将传教士描述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宗教、文化侵略者以至文化特务、宗教间谍，如1962年4月《山东省志资料》王神荫的《美国文化特务狄考文在山东的侵略罪行》（论文作者按：八十年代后，王对狄给了很高的评价），直至八十年代，顾长声的两部著作《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仍未超越“文化侵略模式”。<sup>①</sup>

陈旭麓1980年6月为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所写的序言中说“从鸦片战争起涌入中国的传教士…大都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中国人民久已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是因为，资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必然要利用富有欺骗性的传教士作为侵略爪牙……他们的神学就成了帝国主义的警探和麻药。这个事实也就使中国人民必然要把反洋教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要揭穿他们的伪善及其罪行。……传教士……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斑斑创伤，却是谁也不能抹杀或改变的事实。”<sup>②</sup>

1989年史静寰的博士论文《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指出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观目的主要是将中国基督化，而并非配合本国政府的侵略活动；传教士为实现将中国基督化的目的，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在此之后的绝大数论著都肯定了传教士活动在客观上对中国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不同之处在于认为传教士主观上只是要将中国基督化还是殖民化、奴化。

殖民化、奴化的观点有“传教士的活动整体上是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但办教育与其它侵略活动不同，它有侵略的一面，也有与中国利益吻合的部分。教会学校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它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把新的教育模式带到中国来，为一些人创造了学习条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一些主观原因，以往对教会学校的认识有偏颇。我们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态度，不是逢迎一种社会潮流或者实用主义。”<sup>③</sup>“由于它的产生、发展是以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为背景的，因此，它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外国资本

① “文化侵略”的概念见王立新：《“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序言。

③ 赵启重：《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02期，第1页。

主义侵华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文化租界’”<sup>①</sup>“教会学校是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工具，但教会学校的教学活动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sup>②</sup>

“教会学校旨在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使整个中国彻底地基督化。然而教会学校在另一方面也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sup>③</sup>等。

基督化的论点有“教会兴学的目的是为了传教布道，或称之为‘以学辅教’，但教会学校的出现打破了国人陈旧僵腐的教育观念，对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发出了猛烈的挑战，展示了新式教育的美好前景，并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产生了良好的影响。”<sup>④</sup>

有的则回避了其主观动机，直接谈其正面作用如“美国在华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着枢纽和桥梁作用，考察中国近代史，对它的研究有相当意义。”<sup>⑤</sup>“美国传教士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开创了具有西方近代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教育；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推动和协助中国创建新学，并且直接参与改革新学教育。”<sup>⑥</sup>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实践，进而凸显了传统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传教士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介绍，为传统教育改革作好理论准备。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sup>⑦</sup>有的指出把教会教育和殖民教育、教会教育和宗教欺骗、教会教师和侵略者完全划等号是非历史主义和非理性的态度<sup>⑧</sup>。

陶飞亚、刘天路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对在山东的新教传教士，包括文会馆在内的教会学校给予了正面评价。该著作认为传教士是被不了解实情的当地百姓当作外国侵略的祸源和外国侵略的象征。对于教会学校，该书认为“晚清以来实现国家的近现代化同样是中国人民艰巨的历史使命。教会创办

---

① 顾莹惠：《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2期，第1页。

② 丁柏传、郑瑞君：《近代中国教会学校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0年02期，第1页。

③ 李勇忠、李春华：《帝国主义对华的教育侵略与教会学校的二重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第1页。

④ 杨齐福：《教会学校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0年01期，第1页。

⑤ 张生祥、景晓萍：《晚清美国在华教会学校的发展及其评价》，《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⑥ 龚淑林：《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01期，第1页。

⑦ 杨齐福：《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福建论坛》，2004年11期，第1页。

⑧ 刘卫、徐国利：《胡适论西方在华教会教育》，《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5期，第1页。

了近代学校，在客观上是顺应了这一时代前进的潮流”。<sup>①</sup>对于宗教影响，该书认为一方面除神学院外，宗教课程比例不大，如“80年代……在文会馆的56门课程中，神学仅占6门。”<sup>②</sup>（当然，神学课的课时比例比门数比例要高——论文作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虽然“教会学校充斥着宗教气氛，一些学生信仰了基督教，不过宗教信仰与人的社会倾向并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sup>③</sup>本文作者也认为在清末民初，基督教倡导支持社会改良，是一种进步势力，只是到后来，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传入的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科学观念，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相比，才显得落伍。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认为教会学校垄断中国教育，破坏了中国教育自主权。《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则认为“教会学校为国立学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办学经验，提供了新教育迫切需要的师资及除了四书五经之外的一切教材，这自然有利于新式教育的起步。”<sup>④</sup>

1997年出版的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认为：基督教教义更多体现它的民族特点，与中国的佛道等教很难有高下之分。传教士发现基督教与儒教文化的差异使之寸步难行，他们逐渐认识到武力和不平等条约无法强迫中国民众接受基督教教义，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只能有两个选择：一是借助于已被中国人认可的先进的西方科学和文化来抬高基督教的地位；二是对基督教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传教士当然更愿意选择前者。这就是“以学辅教”的由来。该书并且指出美国来华传教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有能力和条件从事西学传播活动。<sup>⑤</sup>

王立新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上的文章《“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对此前的研究作了评述，指出以前的评价有“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两种，后一种比前一种更少偏见，但仍有不足。

值得指出的是王立新在《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特列了最后一章《传教士对晚清中国现代化的误导》。在完全超越了“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模式之后，指出了传教士传播西学的局限。王著指出传教士的知识

①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②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③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④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⑤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水平和文化素质与当世杰出科学家相差天渊。把神学目的论带进自然科学的引进，把宗教社会史观带进社会科学的传入；把西教、西学结合，导致中国人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传教士错误地宣传基督教是西方社会进步的本源，从而企图用“基督教救中国说”来影响中国，而这会把中国的现代化引入歧途。王著指出，由传教士承担西学东渐的任务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揭示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和唯一性，还应该指出这种选择的历史局限性。

在肯定传教士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时，指出其局限性是必要的。遗憾的是王著没有像史静寰的博士论文那样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传教士不断调整自身传教办学方式，有更进步思想的传教士的不断出现和到来的动态过程。史静寰在指出传教士随时代而调整提高的同时，仍认为“传教士……本身保守过时的宗教思想和世界观也使他们不可能跟上世界进步潮流的发展，真正将西方文明的精华带入中国”<sup>①</sup>。罗荣渠也有类似观点：“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过时的、落后的、保守的部分……传教士输入的西方文化的保守的和反动的一面”<sup>②</sup>。

海峡彼岸的研究则对传教士肯定有余，批判不足。

美国的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部分也经历了“冲击—反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中国中心观”的模式演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柯文、狄百瑞皆有研究传教士方面的专著。

本文“十九世纪后期最有名望和影响的传教士教育家”狄考文的评价是“主观目的基督化，客观效果现代化”。

## （二）对狄考文个人的研究

关于狄考文，一些对传教士教育活动的研究论著多有涉及。如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八章《传教士开办洋学堂》第二节“早期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一瞥”中说“登州文会馆……宗旨是‘道德其一，学识其二’……所谓学识，就是指学生要接受传教士的训练，为扩展教会势力和为外国侵略者及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同时也提到了“数理化课程”确实是起了启蒙作用……《万国通鉴》、《富国策》使得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不能不引起深思，燃起了富国强

---

①史静寰：《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见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9页。

②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过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民的思想。第三节“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华教育会”说“传教士企图利用‘宗教’和‘科学’的‘结合’来‘拯救’中国，他们的实践证明，中国不但没有获得拯救，反而在半殖民地的泥坑里愈陷愈深，使中国人民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遭受无穷的灾难。”这里的问题是虽然自 1840 年以后的相当时间内，中国的半殖民化确实在加深，但恐怕不能说教会学校的兴办促成了这一进程。

对狄考文的专题研究则只发现 3 篇，即李位凯的《狄考文与文会馆》及史静寰的两篇。史静寰的论文主要描述了狄考文兴办教会学校的思想实践由先进到落后的过程。

本文力图从如今要正本清源，就要力戒后设的观念，从头梳理史料，对狄考文在华活动作出全面描绘。通过考察和狄考文有互动影响的人、事，避免孤立、静态的形象。

### 1.3 论文的基本框架

本文想通过收集史料，进行排比考订，尽可能符合原样地描述出狄考文的在华活动经过；在描述过程中，致力于把其思想变化脉络及与现实的互动揭示出来，并注意把其活动放在教会在十九世纪的美国的社会地位、晚清社会变迁、中国人对外国人、外国事物、外国文化态度变化中去考察。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研读文献，进一步围绕狄考文探讨以下方面问题：

1.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即狄考文的中学时代至其去世）美国基督教，尤其是长老会（狄考文所属差会）的一般情况。
2. 狄考文来华后的巡回布道活动（这是通用的正统的传教方式）。
3. 狄考文办学时的中国教育状况、传教士对于教会学校的不同意见、中国官民对教会学校的态度。
4. 狄考文的办学过程，包括文会馆的课程设置（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学、英文、宗教）及其原因、学生课外活动。
5. 狄考文仍反对开设英文课的原因。
6. 狄考文教育活动对山东地区的社会影响（毕业生、其他方面）。

### 1.4 狄考文生平及思想简介

狄考文生于美国宾州，而宾州西部与弗吉尼亚、北卡莱罗纳恰是 19 世纪长



老会扩张速度最快的地区。<sup>①</sup>1857年，狄考文从杰斐逊大学毕业后，成为宾州碧弗学校的负责人。三个学期后，他本可继续办学赚钱，但感到被感召去传福音，就出售了学校，进神学院深造。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美国高等院校在校生仅有数千人。<sup>②</sup>

1863年，狄考文与其妻子朱丽娅（有人译为“邦就烈”）登上航船。后来，狄考文的兄弟狄约翰（接替狄考文任上海印刷所监督）、狄乐播（在潍坊传教），妹妹狄丽莲（在登州传教），朱丽娅的妹妹麦琪（在登州传教），也成为来华传教士。1864年来到中国，朱丽娅创立登州蒙养学堂，第一年招收了六名学生。1873年狄考文扩充山东蒙养学堂，添办“正斋”，1876年学校定名“文会馆”。1877年狄考文到上海参加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作《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大会发言。1880年，汉诺威大学授予狄考文神学博士，1888年伍斯特大学因他的“文字上的、科学、哲学和神学上的成就，在传教士和教师工作上的成功”授予他法学博士，在1902年杰斐逊大学百年校庆时，因他“作为学者和福音牧师的杰出能力和服务”授予他法学博士。1898年8月，他的终生好友，时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写信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学校工程系主任的职务；他以要继续传教和翻译圣经为理由拒绝了。1898年12月，他收到南京大学堂监督的邀请，请他担任这一新生机构的校长，<sup>③</sup>他也没有接受。

狄考文于1908年9月28日上午去世。狄考文去世后，英国浸礼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者，良好的管理者，有力的布道者，杰出的学者。”长老会差会总部通过一份文件说：“他努力的结果会长久延续，他的名字会在中国传教士工作的历史上一一直占有一个显著位置。”总部的布朗干事在给狄乐播的一封信里说：“我认为他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sup>④</sup>

---

① [美]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许季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57页。

② [美]劳伦斯·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第二册），洪成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页。

③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Philadelphia : The Westminster Press , 1911) p293,此书以下简称 CWM

④ CWMP335、336

## 第2章 狄考文办学背景及起因

### 2.1 美国状况

#### 2.1.1 狄考文来华前的美国教会与教育

##### (1) 长期自觉作为进步力量而不衰的教会

以前不少论者认为传教士在其本国是落后保守力量，只是在前近代化的中国，相对于中国更落后保守的封建统治者来说，才不自觉地起了暂时的、有限的进步作用。如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中说“从本质上说，传教士并不是进步势力的代表，他们的人生观与宗教观十分保守……由他们从事教育活动，输入西方文化并以此影响中国社会和教育发展进程，实在不算什么幸事”。（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幸事并非因为他们是外国人）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山东社会》中说，“基督教传播西方宗教和文化，对长期闭关的中国来说也并非完全是一件消极的事情”。王立新在《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中也持同样看法（详见本文《研究动态与综述部分》）。

在世界近代史上，自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可以说长期是作为最进步的力量而存在的。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清教徒发动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由具有宗教热情的士兵组成。<sup>①</sup>“近代西方经济伦理的变革，是新教的重要贡献之一。特别是清教徒宣扬的世俗职业神圣论，提倡勤奋劳动，艰苦创业和发奋图强精神，谴责懒惰和厌恶劳动的恶习……鼓励教徒献身社会改良和公益福利事业。”<sup>②</sup>在政治上，宗教改革及其后形成的新教，大有功于此后英美的政治变革，因为宗教改革主张，无论君王或庶民在天启的律法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一切成为后来自由平等信念的深刻基础。在经济上，新教打破中世纪的圣俗观，如马丁·路德说的：“工作就是祷告”，亦如加尔文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使人们相信可以在积极的工作中荣耀上帝，这为经济财富的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sup>③</sup>

①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② 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③ 江登兴：探寻一个清新刚健的新教传(<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759243>) 凯迪社区 (<http://club.cat898.com/newbbs/index.asp>) 之猫眼看人 (<http://club.cat898.com/newbbs/list.asp?boardid=1>) 发布时间：2005-8-30 21:01:00

罗荣渠认为“特别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反教会是近代西方一切激进的、革命的思潮的特征之一”<sup>①</sup>。但“与法国和德国不同，在美国人们并不把启蒙主义运动视为对宗教的挑战。美国的宗教组织通常接受启蒙主义运动关于科学、教育和民主不断进步的思想，美国启蒙主义运动的主要发言人也不像他们在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同道一样抨击教会或宗教……事实上，在美国宗教版图上政治上持进步态度与保守态度的教会团体几乎势均力敌。”<sup>②</sup>也许正因为这样，1783到1876年间（美国）教堂的实际数目稳步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教堂数目的增长比例超出了人口的增长率……教堂数与人数的比例，从1780年每一千人一所教堂，到1800年1100人一所教堂，到1870年时已是每532人就拥有一所教堂。<sup>③</sup>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说“宗教……被视为美国首要的政治组织。因为宗教就算没有灌输培养对自由的热好，但也促进了自由的运用……美国人坚信宗教对于共和国各种政治机构的维系是不可或缺的。这个观点不是仅仅哪个阶层的公民或哪个党派的观点，它是属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sup>④</sup>

美国史学家布卢姆说在美国19世纪前半期的改革时代时的人们认为“进行改革的适当机构是教会和慈善机构，而不是革命运动甚或政党。……牧师……中间有许多人认为，他们的职责不仅是传播福音，而且应该推进改革事业，帮助实现美国生活的希望。”<sup>⑤</sup>“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又一奋兴运动时期，奋兴运动的许多领袖，第一次把拯救灵魂的愿望与积极从事社会改革的兴趣结合起来。这一新的奋兴时期最伟大的传道士是查尔斯·芬尼，他……宣扬……从事有益的工作和慈善活动。”<sup>⑥</sup>“通过成立服务公益的自愿团体以及兴办学校、反对酗酒以及解放奴隶，教会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sup>⑦</sup>可以看出，狄考文来华前，美国教会是作为有意识地推动美国社会改革进步的积极力量而存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② [美]约翰·科曼：《美国的宗教及其研究》，见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③ [美]劳伦斯·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第二册），洪成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④ 转引自[美]劳伦斯·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第二册），洪成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6页。

⑤ [美]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上），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1页。

⑥ [美]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上），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10页。

⑦ [美]约翰·科曼：《美国的宗教及其研究》，见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9页。

在的。我们或许可以论证“论西学西政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sup>①</sup>，却很难论证西教会使学乱政衰。美国总统麦金莱“传教士是文明的先锋”的说法或有可商榷之处。美国多数宗教人士主观认识上都认为基督教和现代文明是紧密相关的，他们的意识没有违背客观实际。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狄考文所说的“我们刚卖给中国政府一大套中文字模。他们将要使用金属字模。这是他们向前迈出的的一大步，将大有裨益。中国缓慢地然而必将向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屈服。”<sup>②</sup>否则，中国政府采用金属字模，与基督化有何关系？

## (2) 教会办学

教会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是兴办学校。“全国各地各教派的私立教会学院增多了。在 1830 到 1850 年的二十年间，大约建了八十所这样的学院。”<sup>③</sup>事实上，美国早期的九大学院，除宾州大学外，都是各教派所办。1780 年到 1860 年间新成立的学院只有少数是公立的，其余均为某个特定教派的利益而创立。“除了个别例外，1850 年以前，美国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均由教会所办……1865 年以前，美国百分之九十的高等院校校长为神职人员。”<sup>④</sup>史静寰在其后来著作中也提到“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教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近代以后，教士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往往高于其他人。”<sup>⑤</sup>传教士（传教士与教师）的双重身份并不难理解，它不过是教士们在自己母国所扮演的角色在地理上的迁移……在中国做教师工作对他们来说本来就不陌生，很多传教士入华前就是教师<sup>⑥</sup>。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哈佛学生中，来自牧师家庭的占最大比例，毕业后做牧师的也是最多的。其 1643 年制定的规则规定：学校要使每个学生认识到：“他们生活和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而以基督为根基，作为全部健全知识和学问的唯一基础”。学生“每天诵读圣经两次，按照导师根据个人的能力所提出的要求，准备提交一份关于他掌握圣经情况的报告，”<sup>⑦</sup>美国在 1874 年以前，因用政府预算资金投入中学是否违宪有争议，以至于没有什么公立中学的存在，多数私立中学都是教会所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会给新成立州筹建了学术机构和学校。19 世纪四

① 这是清末维新运动时《湘学报》上的一篇反对在中国传布基督教的文章。

② CWM P158

③ [美]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上），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 422 页。

④ [美]约翰·科曼：《美国的宗教及其研究》，见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77 页。

⑤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66、167 页。

⑥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79、280 页。

⑦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65 页。

五十年代，系统化了的新教思想已成为美国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播这些新教思想也就成了新建立的教育机构的责任。<sup>①</sup>1815年美国教育联合会成立于波士顿，目的是要帮助和教育青年人成为福音传播者。<sup>②</sup>杰西·卢茨也提到“在美国，许多大学由各教派创办，来中国的许多美国传教士则是这些教派大学的毕业生，从而他们视高等教育为教派正常的职能。”<sup>③</sup>由此看来，“西学与宗教的合流是近代中国早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sup>④</sup>，（即在西方是分流，到中国过后变成了合流）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既然教会在美国就有着长期办学实践，办学成绩也不错，就不能说教会在中国办学绝非是其权宜之计、创新之举，也不能说教会学校必然是在学术上有缺陷的。

### （3）美国长老会

19世纪初美国的第二次宗教觉醒时，“在各教派中，吸收新教徒热情最高的要数长老会。”<sup>⑤</sup>这次觉醒的重要代表人物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1824年获长老会牧师资格。<sup>⑥</sup>长老会强调传教士受教育程度要高，因此特别热衷于办教育，他们在东部办了普林斯顿大学，在西部办了太平洋大学，共办了49所大学，遍布全国各地。

随着南北战争的临近，长老宗新派教会于1857年分裂，旧派教会于1861年分裂。1864年，南方的两派合并，成立合众国长老会，北方的两派于1869年到1870年也联合组成美利坚合众国长老会。<sup>⑦</sup>

### （4）海外传教

美国人从英国教会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大而开展新的传教活动的做法中得到启发了，他们把眼光投向从来没有听过基督名字的千百万异邦人民。1810年成立了美国国外传道理事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两年以后，第一批美国传教士乘船到印度。该理事会基本上属于公理宗，不过长老宗和归正宗有一段时间曾给与支持。长老宗的海外传

① [美]劳伦斯·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第二册），洪成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② [美]劳伦斯·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第二册），洪成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③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④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⑤ [美]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许季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55页。

⑥ [美]劳伦斯·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第二册），洪成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⑦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页。

教总会成立于 1818 年。<sup>①</sup>狄考文来华的 1863 年处在美国传教士大规模海外传教的初期。1870 年，中国有 200 名美国传教士；到 1900 年有 1000 名。<sup>②</sup>

传教士自信基督教对西方的繁荣和人道主义的伟大贡献，因此希望亚洲人也相信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如果他们想采纳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们必须同时也采纳基督教。<sup>③</sup>

## 2.1.2 狄考文的美国生活经历

### (1) 代课及办学经历

狄考文在亨特斯顿学院就读时，因经济困难，于 1853-54 中止学业到一乡村学校任教。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段艰难经历。我还不到 18 岁，看上去年岁小得多。许多学生比我大。不过，我支撑住了，很好地完成了工作，比其他任何阶段增长的阅历都多。”<sup>④</sup>此乡村学校停办后，他返回学院继续求学。1855 年转到另一所学院就读时，狄考文教几何和希腊语来挣得学费。1857 年，狄考文从杰斐逊大学毕业后，成为宾州碧弗学校的负责人。第一学期学校只有二十个学生，收入几乎负担不了他的食宿费；在狄考文的努力下，第三学期末，学校已有九十名学生。他本可继续办学赚钱，但感到被感召去传福音，就出售了学校，进神学院深造。这些任教以及办学的成功经历对狄考文后来在中国办学应有其影响。

### (2) 那时的美国大学

需要指出的是狄考文学生时代美国的大学并非像今天这样完善。有专业学院的、可以培养研究生的和强调学术研究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出现。在这期间建立了很多学院；但是其中有图书馆、有学者等必需条件，可以使其成为创造性文化生活中中心的却寥寥无几。<sup>⑤</sup>这可以看出，狄考文后来向美国国内申请把文会馆升格为大学，并非是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因陋就简的考虑。

---

① [美]威利斯顿·沃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39 页。

② kwang-ching liu “Introduction” in kwang-ching liu ed •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1

③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91 页。

④ CWMP32

⑤ [美]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上），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 422 页。

## 2.2 中国状况

### 2.2.1 中国官民对教会学校的态度

中国官民最初并不接受教会学校。以文会馆为例，一开始，学生都是家庭无力供他们上本地学校的。他们在狄考文这儿除了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还可以得到免费衣食，这证明诱掖足以<sup>①</sup>克服允许小孩受可憎的外国人影响的耻辱。这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事实上一直到在义和团运动之前的，对家长来说，即使是基督教徒家长，把孩子送到狄考文的学校，并不是一件小事。<sup>②</sup>作为燕京大学前身的那所学校，开学时以类似优惠的条件，也是只招到三名学生。<sup>③</sup>早期的教会学校多是从极小的规模发展起来，这一方面和教会的人力财力局限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们招不到更多的学生有关。

一位当地受人尊敬的牧师是从狄考文的学校毕业的，他写到，“当我的父母最早把我送到学校时，全村严重抗议，他们说外国人是会用魔法吸小孩血的吸血鬼。然而我还是被送去了学校，尽管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有一点儿害怕。当我在新年假期回家时，那些发出邪恶预言的人把我仔细检查一番；当他们发现我不仅还有脉搏跳动，甚至还比以前脸色更红润，活得更好了时，他们就说我在那儿的三个月还不足以显出可怕的后果，等着瞧！”<sup>④</sup>

在一段时期，似乎一切和外国人有关的人、事都被视为异端而受到猜疑打击。狄考文在招远发展了一位苗先生入教，不久，一对差役逮捕了他和租给他房子作教堂的人，把他们送到县衙，房东被控告租房给“洋鬼子”，被重责二百大板。苗先生被责备，因邪恶的教义和行为，比如在祈祷中下跪，县令判决他受杖责五十，带枷入狱。晚上他重受审讯，第二天上午他带着颈枷手铐被发送到三十英里外的栖霞，在他到达后，他被传唤到县令面前，面对由招远传来的指控——像与洋鬼子结伙，假借传教，炫诱百姓，身中邪术，强占房屋，结社祸国和大小罪行。他被责令忏悔，在他不愿这样做时，先受了三百答，又在脸上被打了一百下。第二天他又被传唤，当他仍不愿意忏悔时，又被责打了一顿。把房子租给他的老妇被他的家庭成员和县令抓住责打，这群家伙也打了按中国

---

① 在此说“足以”倒不如说“才能”——本论文作者。

② CWMP133

③ “早在1870年，美以美会就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小学。这所学校只有一间教室，3个学生，而且，这3个学生还是因为学校答应每天给他们一碗米才入学的。”见李跃森著：《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④ CWMP135

习惯撮合交易的中国人。<sup>①</sup>

在德国人强租胶州湾并建筑铁路后，那一地区的谣言更凶了。每一个枕木下面一定埋着一个中国小孩，给火车提供车轴润滑油，要炼取人的脂肪，谁都能看出外国人为此准备的大锅炉；在成堆的人肉变成的土下面，埋着骨头。<sup>②</sup>

天津教案时，有人报告说狄考文正在把学校的男童养胖以在杀死他们后挖眼掏心制迷药来给当地人施巫法。

幸运的是，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19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国人对现代化重要性认识日益增加；新教传教士活动也在这一时期大发展。这两种发展互相影响。<sup>③</sup>1877 年至 1890 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由 6000 人增至 16836 人。1880 年至 1890 年，狄考文所在的美国北长老会在华办学数量由 55 所增至 180 所。<sup>④</sup>狄考文在 1877 年的报告里说：“我们料想明年会有大量新生。急切想来的人数超出了我们的接收能力，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sup>⑤</sup>而 1905 年（清朝停止科举考试）之后，申请进教会学习的人多到学校无法接收。<sup>⑥</sup>

### 2.2.2 狄考文办学时的中国教育状况

按教育史专家陈景磐的说法，洋务运动以前清末封建教育总特点是空疏腐化，表现在：1、学校成为科举附庸，官学有名无实；2、科举考试走向腐化，舞弊司空见惯；3、思想控制变本加厉，教育内容日趋空疏。<sup>⑦</sup>《中国教育通史》认为“清代教育，到鸦片战争时期已空疏无实，腐败落后，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sup>⑧</sup>

### 2.2.3 传教士对于教会学校的不同意见

在学校刚开办和随后的一段时间，差会和传教士们对教育的态度与五十年后<sup>⑨</sup>很不一样，一些非常诚挚和智慧的传教人员坚持认为神职人员从事学校教育

---

① CWMP187, 190

① CWMP135

② Irwin Hyatt,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70-1890: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 in Kwang-ching Liu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93

④ Irwin Hyatt,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70-1890: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 in Kwang-ching Liu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98

⑤ CWMP145

⑥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⑦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4页。

⑧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⑨ 即19世纪最后几年及之后的时期。



是与他们来此的职业不相符的。这些人举出使徒的例子，指出办学对使人们皈依上帝的有限作用。早期的传教士一般只把教会办的学校、医院等看成一种慈善姿态，而非传教事业本身的一部分。<sup>①</sup>学校不受传教士重视的一个标志是1868年到1877年《教务杂志》<sup>②</sup>上只发表了两篇和教育有关的文章。<sup>③</sup>而到1890年，巴勃在传教士大会上发言说“教会中对教育工作缺乏同情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sup>④</sup>。

提倡办学的人，关于用学校达到的直接目标也没有一致看法：目标应是学生的皈依，以此来培养当地牧师，而其他结果都无足轻重？还是应把学校看作是为后来播撒基督教真理的优良种子而准备土壤的有效工具？狄考文在《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一文里有力而充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他的观点可概括为近代教育有益于教会。

他说教育可以提供能干可靠的牧师，为教会学校提供教师，并通过他们把西方的先进教育引入中国，准备好在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入中国过程中起领导作用的人物，而这将进入中国更高阶层，给当地教会自立，有利于当地教会抵制来自中国的迷信的侵蚀和来自西方的有文化人怀疑主义的攻击。

“只要中国的基督教作品还都出自外国人之手，中国教会就仍将是虚弱和依赖性的，中国急需一批训练有素，知识丰富的本土牧师，他们能写书，保卫和加强基督教信条，把这些信条运用到中国教会的环境里，随着中国当地基督徒数量的增加，随着基督教传入内地，中国的基督徒将越来越不受外国人的直接教育和控制，那时，就会有来自异教迷信侵蚀和中国经典的不良影响的危险出现，各种迷信在人们的心灵里找到合适的土壤，它们的实质如一而形式常变。中国形式多样的迷信不会很容易消亡；要是不被不断地抵制、揭出、暴露，迷信就会和基督教混合，将基督教败坏。”<sup>⑤</sup>“不久，西方的怀疑主义也会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泛滥，要驱走这些迷信，在异教徒面前证明和维护真理，需要高层次的教育，未受教育的基督徒可以不被未受教育的异教打败，但会被受过

---

① Irwin Hyatt,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70-1890: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 ,in kwang-ching liu ed •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p94

② 即 *Chinese Recorder* 一份在在华传教士中订阅较广的报纸。

③ Irwin Hyatt,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70-1890: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 ,in kwang-ching liu ed •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p96

④ Irwin Hyatt,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70-1890: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 ,in kwang-ching liu ed •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p98

⑤ [美] 狄考文：《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见朱有曦、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教育的异教打败，总而言之，我们不想把裸体的基督教介绍给中国，我们想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引入她，使她带着这样的武器和支持，使她能独立前行，维持自己的纯洁，防卫任何敌人。”<sup>①</sup>

考虑到关于学校目标的这种些理想，狄考文在论文的结尾呼呈学校应是高等等级而非初级的，尽管不排除初级的，自然科学应在教学中占有显著地位。

到了1890年，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狄考文更具体说明必须培训新的知识分子以代替中国固有的士大夫阶级借以取得统治的地位。他说：“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这就中国来说，比其他异教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sup>②</sup>

## 2.3 直接办学起因

### 2.3.1 朱丽娅的首创

1864年9月，文会馆的前身登州蒙养学堂第一学期开学，六个未信教的小男孩之前都没上过学，学校由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教室组成。狄考文的中文教师张先生也来教这些男童，一位当地妇女负责厨房，狄考文一直把这全部工作的启动归功于朱丽娅。在前十年，学校几乎全由朱丽娅照看，很多年以后，狄考文在一次与费驰夫人的谈话中说：“当朱丽娅在登州开办男童寄宿学校时，我认为那是一桩小事，但随着其影响的扩大、深入，我看到她独自办学太辛苦了。我知道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性格来塑造这些男孩，我也要投入到学校里去。”<sup>③</sup>在朱丽娅去世不久后，狄考文为她写了一部简短的回忆，当中说：“她是一位有成就的教师。在学校的早期岁月里，她不只是教学，她做了学校三分之二的工作”<sup>④</sup>

---

① CWMP132

② [美] 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见朱有瓓、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③ CWMP129

④ CWMP277

### 2.3.2 巡回布道的困境

1861年北长老会代表到达山东省，于登州创立第一所总堂。该总堂之创建人为倪维思、盖利、但福思诸牧师及其眷属。<sup>①</sup>据传记作者说狄考文到登州后不久，“登州对福音没有什么积极反应，对宗教书籍的需求很快被满足，以致于书的销量变小。街头布置和小教堂服务的新奇已过去。”<sup>②</sup>狄考文开始花很多时间进行巡回布道。

1866年狄考文在日记里记到当年的一次布道旅行时说，“我每到一个村子，‘鬼子’、‘鬼子’的称呼是萦绕耳畔。这称呼通常是怀着恶意地喊出的。我想在最后两天里，我听至少一万人喊过了。”<sup>③</sup>甚至在1878年10月中到11月中旬狄考文的一次巡回布道中，“有时看来没人愿意注意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我没能让任何人前来听我们布道，不少人看到了我们，但他们经过我们，并未停留，一个小男孩冒险上前问我们从哪儿来，这时马上有个附近的男人因他对我们说

量旅行、布道、售书。过去两三年来，更多地投身于学校，我没作多少巡回布道了。狄考文最后一次巡回布道是在1878年10月中到11月中旬。<sup>④</sup>

这一经历并非狄考文的个人现象。很多早期来华传教士对布道成果之微末发出感慨“布道结果就像把种子撒入水中，对着风浪讲话，在沙滩上留名”。<sup>⑤</sup>“直接传教的成效缓慢，使一些传教士愈来愈重视把教会工作从拯救单个人灵魂转向大规模的教育计划。”<sup>⑥</sup>杰西·卢茨总结说“由于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冷漠态度，使一些传教士感到沮丧，于是他们在19世纪建立了新学校和其他组织。”<sup>⑦</sup>

当然“困境”并不意味着毫无成绩。按《中华归主》的说法“本省（山东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页。

② CWMP110

③ CWMP121

④ CWMP127

⑤ CWMP127

⑥ CWMP126

⑦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⑧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过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⑨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省——论文作者) 乡村旅行布道事业一开始便相当成功”<sup>①</sup>。本文认为, 这两种观点都是相对来说的, 可并行不悖。困境是相对于传教士投入的热情、精力来说的, 成功是相对于别省来说的。

---

<sup>①</sup>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409页。

## 第3章 办学过程及其影响

### 3.1 课程设置及其原因

狄考文在1890年大会发言中提倡“完整教育”，并说这已是文会馆的实践。这是先进和超前的。到20世纪，才有更多的传教士认识到要使中国皈依基督教需要好几代的时间，因此他们承认这一任务主要应由中国人而不是外国的福音布道者来完成。他们必须更加重视创设中国的基督教会；这种教会将需要经过充分训练的中国牧师，而不仅仅是中国助手。这些牧师应当跟上西方的宗教学说，同时以自己的中国学问赢得本地区百姓的尊重。这就意味着准备做牧师的学生必须接受比19世纪的惯例更高水平的教育。而狄考文在19世纪的办学活动正是按这一要求去做的。狄考文所办学校的课程主要有自然科学、中国经学、基督教义三大类，此外还有社会科学、音乐、体育等。

#### 3.1.1 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教育在文会馆中有重要地位。在文会馆的56门课程中，神学仅占六门，中国经学课程也不到四分之一。当时中国人知之甚少的数理化一应俱全。1891年文会馆提供的六年制课程包括了代数、几何和圆锥曲线、三角和测量法、测量和航海、解析几何和数学、物理学、微积分、天文学。此外还有两年的物理课程和一年的化学课程。学校里这样全面系统地开设自然科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创举。<sup>①</sup>1878年3月，狄考文给北京的丁韪良写信说：“你知道，自然哲学是我的爱好，我对它的讲授可能比中国任何学校都完备。”<sup>②</sup>狄考文还在登州教过气体力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这在美国也算中等以上水平了。19世纪中期开始，受德国大学办学模式影响，一些美国大学教学水准开始有巨大提高，但这种发展既缓慢又不均衡，离遍地开花距离甚远。甚至到19世纪70年代，普林斯顿的新任校长詹姆斯·麦科什提出建议，在古典学课、数学、哲学等传统学科之外开设新课程，并获得必要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资源以吸引一流学者教授这些课程时，却震惊了校中那些老教员。<sup>③</sup>

①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② CWMP167，自然哲学那时用以指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

③ [美]劳伦斯·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第二册），洪成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狄考文以课堂讲稿为基础编写的代数几何课本在全国被广泛使用，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仍保存有其编著的《笔算数学》、《形学备旨》、《代数备旨》等教材。其中《笔算数学》有1851（国图目录如此，明显有误，可能是1875——本论文作者）年、1898年、1906年、1917年四个版本，《形学备旨》有1875年、1898年、1903年、1904年、1905年、1908年六个版本，《代数备旨》有1875年、1898年、1902年、1903年、1905年、1908年六个版本。其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文会馆的物理化学实验在当时也很有影响。在其他学校，在1900年之前，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还未受重视，因此一旦购买了校园场地，主要资金就用于建筑教室、学生和教职工宿舍。<sup>①</sup>1881年在差会成员们请求把学校改称大学的申请中重点强调的一件事是登州学校已拥有了相当多的物理化学仪器，人们相信这已是中国最大规模、最多种类的此类仪器。据《文会馆志》统计，当时学校实验室有水学仪器36件；气学仪器20件；蒸汽仪器14件；声学仪器19件；力学仪器36件；热学仪器27件；磁学仪器15件；光学仪器60件；电学仪器128件；天文仪器9件。<sup>②</sup>狄考文也习惯于带着自豪提起这些仪器。狄考文对自然科学的关注是很前沿的，费什提到狄考文曾“用X射线展示了我们的手骨”<sup>③</sup>

1888年10月29日狄考文给一位教师的信里说“中国最可能需要事物，首先是电力工程，尤其是电报，其次是民用工程，尤其是铁路勘测和铺设。为在这些事物的一项或全部作专门准备会有价值的。但对即刻使用和作为这些事物的初步来说是必需的是对科学仪器的现实知识——怎样制作和使用，我自己在没有任何老师指导，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劳动，依照书本，做起了这件事。”每当一群狄考文的早期熟人在一起说到他时，一定会提到的一件事情是他在仪器、机器的制作与使用方面的成就。在中国，他在这方面的声誉是如此巨大以致于有时这几近于成为他的一项负担。我们已看到上海教会印刷所暂时监督的职务被交给他，这是违背他选择意愿的，因为如他在那时的一封信里所表达的那样，负责人把他看成一位多面手，能做他被交给的任何事情。<sup>④</sup>在碧弗(Beaver)

---

第432~433页。

①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② 张美：《登州文会馆与山东教育近代化》，《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6卷第3期，第105页。

③ CWMP250

④ CWMP236

的学校里，狄考文第一次做了几件仪器用于帮助教学。<sup>①</sup>

“实验室、电机房、印刷厂、天文台可算是齐大的四大设备，在登州时已粗具规模。1904年迁到潍县后，电机房和机械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能制造较大的铁质风轮，利用风力吹动风轮，把井底下的水提上来，供全校教职员和学生使用，还能制造柴油机和其他理化实验用品。”<sup>②</sup>狄考文在1897年给大学同学的信里说：“我已在科学仪器的制造上投入了一些时间，相当的心思和金钱。我在这方面有天然的兴趣，我看到在中国的教育中推进自然科学，我们现在和美国一般大学有一样好的仪器，是我们毕业时杰斐逊大学的两倍还多；其中三分之二是我自费现场制做的。”<sup>③</sup>仪器制作是一项缓慢而长期的工作，在狄考文在登州学校教学的早期，还不怎么需要仪器，因学生们还不到接受物理教学的水平；但不久后他就记下了比如说不用空气泵教气体力学的困难。那时，他给一个牧师班的学生上课，他用心地让人知道他的学校决非神学研讨会，他认为让人们理解这是一所提供世俗教育的机构是至关重要的，在他一生中，狄考文多次给当地的牧师候选人上课；在学院给他们提供学习西方科学的机会之前，狄考文习惯让这些年轻人了解足够的自然运行的知识，以使他们在自己同胞中成为更好的领袖。这样，关于那个冬天在神学班的工作，他在1874年2月的日记里写到：我同意他们每天一节课，一天物理，一天化学。我复习了光学和机构学、电学、化学。我几乎把所有时间用在教学、试验，得到仪器上。很多时间我都在请木匠和铁匠工作。我制作了演示机械学所需的大部分东西，和许多光学方面的东西；还完成了摩擦生电装置，给我那套电流仪器添加了物件。我用新电池很好地展示了电灯和金属爆燃。伦可夫感应线圈表现得非常好，做了很好的展示。我用氢氧光作了两晚的展示。在化学上，我制作了各种气体，用它们充分地作了试验，它们给了各种气体，用它们充分地作了试验，它们给了我不少的麻烦，但我非常成功，我做了轻重碳化氢，用它们作试验，然后我制作了足够在整晚上点亮房间的煤气，我给学生们作了比我自己曾见到的要更完备的实验课程，他们学得很好，对所看到的理解了很多，我相信此事会证明我的时间没有白费，我自己也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在实验制作实务方面。可能我会有场合把这知识变为好处的，我还汇集了很好的一套仪器，以后我会试着

---

① CWMP239

②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辑，第115页。

③ CWMP244

进一步使用。<sup>①</sup>

仪器的汇集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他在随后的年月里往里添物件时，每一件都有它们一段历史，狄考文继续亲手或至少亲自监督制作了很多。费用或是他自己负担，或应他请求由朋友为此捐款，一些较大、较贵的物体是狄考文向之发出帮忙呼吁的人捐助的，比如在第一次回美国休假时，他拜会了菲尔德（一位 1866 年完成大西洋海底电缆铺设的企业家），使菲尔德产生了对登州学校的兴趣。狄考文回中国后写信请他捐一台发电机，最终这台菲尔德捐赠的发电机给登州学校带来了照明，两位美国朋友捐资买了一架十英寸反射望远镜及附属设备。尽管常有捐助，还是有相当赤字，他的“约翰叔叔”救济了他。在通过一位熟人订购一套电报设备时，他解释说总部不会提供购买资金，是他自己出资，再加上教会和教育界一些朋友的捐助。<sup>②</sup>

不少文会馆毕业生被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聘为西学教习等可以表明自然科学教育的成绩。杰西·卢茨认为“在 19 世纪，登州学校可能是所有教会学校中开设数学课程门类最多的学校…齐鲁大学宣称它是中国第一所开设大专水平课程的学校不是毫无理由的”。<sup>③</sup>需要指出的是狄考文在教会学校中这样重视科学教育不是为增加学校吸引力向现实妥协的权宜之计，而是他认为本来就应如此。

狄考文曾在 1877 年传教士大会上专门发表《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演说以阐发他这方面的思想。他说：“至少可以这样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所有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由上帝恩赐给基督教国家的，当上帝凭借圣灵唤醒教会从事前所未有的使世界基督教化的伟大工作时，情况也是如此。所有科学都属于教会，这是合乎情理的…教会常常是教育的积极促进者，而它对教育的促进主要是通过牧师的努力来完成的。从教会诞生初期直到今天，许多著名的教会人物都或多或少从事一些教育工作，英国的情况我不能确定，但是在美国我可以断言十分之九的大学校长是由牧师担任的，至少有四分之三教授是牧师，各专科医院和女子学院也有一半以上是由牧师负责管理的，所有这些牧师都或多或少从事一些教育工作。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是否准备谴责所有这些人——包括韦兰、伍斯特、霍普金斯、麦科什等——不忠于他们的牧师职责呢？”<sup>④</sup>在狄考文看来，

---

① CWMP245

② CWMp211~214

③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5 页。

④ [美]狄考文：《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



教会学校教授自然科学不是借用，相反教会学校如果不教授自然科学就是“允许魔鬼来培养人，允许他借用西方伟大的基督教文明所产生的成果”。他认为“基督教的精神特质是启蒙和提高，牧师应该走在人们的前头。”<sup>①</sup>“因此有好些人准备反对整个教育工作，不愿意将西方科学引进到中国来。这既不是正确的政策，也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所在。我们不相信愚昧就是虔诚之母。在中国我们不能不从事教育工作，不管同意与否，西方科学将照样输入中国。教会要是明智的话，就应当站在教育工作最前列，在中国取得如同它在西方国家所取得的地位，充当中国比较高级和优化教育的先驱，这是它固有的权利，也是它应尽的责任。这样做既可扩大科学和文化的影 响，也可促进教会自身的发展。”<sup>②</sup>传记作者费什说“狄考文完全确信福音化中国所能采取的最有力的媒介是学校 和大学。他同样确信在能引入学校课程的全部科目中，没有哪一科在有效地为福音开辟道理方面比得上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包括应用其原理的现代机械，狄考文相信如果聪明的年青人受了这种知识的教育，在基督教影响下皈依基督，走到自己的同胞中去，结果一定是现存的多几个世纪以来对遥远过去的迷信和观念的坚持的消散，这一定会给基督教的进入广开大门”<sup>③</sup>

概括地说，狄考文认为科学本身是有益的，基督教与科学的结合是自然而必要的。

狄考文不仅认为近代科学是基督教文明的成果，还认为前近代科学不昌造成了基督教的衰落。他说“历史向我们表明，整个早期教会是怎样被迷信思想逐渐玷污乃至毁灭的。在造成这一可悲史实的其他原因中，教会缺少真正的精神与物质学说作为助手和同盟者是一大突出原因。我不相信基督教会会再次沦为迷信思想的牺牲品。在近代，上帝赐给教会以光明，使迷信无法抵挡。基督教与真正的科学是不能也不应分离的。”<sup>④</sup>

据齐鲁大学校友王神荫介绍“济南原来的齐鲁大学（以下简称齐大）的校园里有两座三层宫殿式屋顶的教学楼：一座物理楼，称之为“考文楼”；一座化学楼，称之为“柏尔根楼”，用以纪念该校在登州草创时期的创办人狄考文和在

---

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① [美]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② [美]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③ CWMP244

④ [美]狄考文：《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潍县广文书院时代的监督柏尔根。”<sup>①</sup>考文楼是对狄考文首创之功的纪念，也可看作对狄考文自然科学教育的肯定。

文会馆也设有地理、理财学、师范学、万国通鉴、西史近世纪等社会科学。虽然中国传统儒家一直有经世致用的学问，但一则少见专门系统的著作，二则很少有学校教授。这些在当时很新潮的课程，开阔了文会馆的学生的视野。

### 3.1.2 经学

狄考文反对开设英语的原因之一是“学习英文对高水准地掌握中文经典来说是个致命的影响”。而“一个中国人缺少本国语言的知识训练，将损害他所有的外语和科学方面的学术成就。不管外国人怎样看待这种人，而中国人自己却不认为他是个学者。他们会容忍外国人对他们自己的语文知识不够完整，却不会容忍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语文的无知。谁在这方面有了缺陷，他马上就会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sup>②</sup>

狄考文的这一估计有一定正确性。卢茨认为“教会大学毕业生想在政府机关就职是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古汉语知识较差，因而他们很难受到传统的中国学者的赞赏，而这些传统的中国学者中有很多人在政府里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sup>③</sup>

经学课程的开设取得了较好结果。在 19 世纪的 70、80 年代，狄考文一直鼓励自己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继 1873 年文会馆第一批毕业生中的邹立文在乡试中取得好成绩之后，文会馆又有十几个学生通过了这一考试。这些说明文会馆提供的一参加科举考试为目标的中学课程相当成功，这一点曾为文会馆赢得很大声誉。<sup>④</sup>

不过狄考文主张开设经学和自然科学的出发点不同。他对自然科学本身就是欣赏的，而对中国经典本身的思想价值，他并不认同，甚至认为是负面的。他在传教士大会上曾说“中国的基督徒将越来越不受外国人的直接教育和控制，那时，就会有来自异教迷信侵蚀和中国经典的不良影响的危险出现，”他办学就是要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学生，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

①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 辑，第 106 页。

② [美]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01 页。

③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72 页。

④ 史静寰：《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见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02 页。

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sup>①</sup>

可以说，狄考文在学校里开设中国经学课，与下面将提到的不开设英语课程，完全是在当时中国特定环境下的权宜之计。

1891年登州文会馆一览表对课程作了扼要说明——“目前所开的课程把中国经典、西方科学和宗教教育最佳地结合在一起”。

### 3.1.3 英文

史静寰认为狄考文“从70年代引导潮流的人演变为90年代的保守主义者”<sup>②</sup>。海亚特也认为“在1877年领导潮流的狄考文，到1890年已落在—场革命后面，显得保守”<sup>③</sup>。这两位学者主要的判断依据是到1890年，在一些教会学校已经用英语进行除中国文史外的教学时，狄考文仍反对开设英语课。狄考文提倡“完整教育”，当今的学校不开英语课可说是不完整的；但在当时不开英语课，笔者以为还不能简单地说是“保守落后”。

狄考文在1890年大会上《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发言中专门阐述了反对英语教学的理由“学生念了两三年初级英语就感到满足，他只须交清了学费，就可以自由地离开学校。由于掌握了英语，他可以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sup>④</sup>即进行英语教育就会妨碍学校的宗教性和学术性。反过来，只用中文进行教育的好处是“1. 只有全面地应用中国语言，对学生才有帮助。2. 接受本国语言的完整训练，是一个人在群众中取得声望所需要的。3. 中文教育会使人有效运用他所掌握的知识。4. 中文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同周围的群众打成一片并影响他们。5. 受过中文教育的人将比那些受过英语教育的人更能与群众打成一片。”<sup>⑤</sup>

可以看出，狄考文认为开设英语课只能造就辍学而去的买办<sup>⑥</sup>，不开英语课才能培养学到为中国人民需要的知识、为中国人民欢迎而愿意并有能力服务中国人民的人才。狄考文是鄙视买办的，认为“这种人道德品质之坏，往往触目

---

① CWMP131

②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③ Irwin Hyatt,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70-1890: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 in Kwang-ching Liu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99

④ [美]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⑤ [美]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02页。

⑥ 这里的买办指在华外国洋行的中国职员。

皆是”；在 1881 年 2 月 14 日给差会总部的信里认为“未受外国人口的特别诱惑和腐化影响”是登州的一大优势。买办是否是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阶级也许可以讨论，但笔者不能认同在当时一所学校培养买办就是进步的，不培养买办就是保守的。

开设英语课是否只能造就买办可以有疑问，但在当时狄考文的担心是有现实依据的。当然最好是一所学校能像清华或燕京那样培养出英语、中文、西方科学俱佳而又服务于中国人的人才。需要指出的是直到 1908 年狄考文去世还没有哪所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成批地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他一直认为“主张用英语教学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决不是轻视中文，而是试图英语和中文同时并用。这个意见在理论上是蛮好的，但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时间不够是这些理论的要害所在。掌握中国经典知识和中文风格，对于一般人来说需要多年的努力，加上学习西文和西方科学至少要花两倍的时间。这样比起一般的教会学校来，势必要费很大的力气来劝说学生留在学校完成学业。还必须注意到，英语的学习往往打掉了年轻人学习本国文学和写作的兴趣。对那些英语基础好的学生，再教以中国经典和中文作文，简直难如登山，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成功的。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唯一办法是在学好中文以后再学英语。可这办法不是经众人确证的途径，因此也不是普遍可行的办法”。<sup>①</sup>在培养不出理想的全才时，退而求其次，也不能说具备相对完整中文和西方科学知识但不会英语的基督徒就一定不如会一些英语但只有最肤浅的中文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人有益社会。

狄考文认为即使是花两三年时间也得不到什么全面的知识，如果说能得到的话，这种肤浅知识也不会受到社会的重视。只有全面地掌握知识，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必然的结果，一个学生必须经历漫长的道路学完全部课程。完整的教育所给予这种声望和所展示的美好远景，会把学生留在学校里直到完成学业为止。这里我们看到应用中国语言教学可以排除英语教育所面临最根本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孩子中途辍学，同时对他们的品格基本训练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他说他深信，除少数例外，依教会学校教学英语的历史看，他的见解还是切实可行的。实际的做法是：一方面教以有限的英语和少量的其他知识，另一方面是授予优化的中文教育，并从中文学习中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后一好做法，开始时在通商口岸赚钱会比前一种少，但从整个中国来说，它会

---

<sup>①</sup> [美]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见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02 页。

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并使受教育者能够发挥更大和更有效的影响。

狄考文认为获取知识不仅是为了拥有知识，而是为了运用它，并传授给别人。“一个受英语教育的中国人，他的情况和外国人差不多，他掌握的知识在运用或影响别人之前，必须经过中文加工。科学的真理只能应用恰当的术语来表达，这在中国尤其如此。概念是新奇的，科学术语很难懂，且与日常生活距离较远。还有，在这书报行销的时代，一个人必须既能说又会写，否则他将失去一半影响他人的能力。这种概念也同样充分应用于宗教宣传。如果一个受英语教育的年轻人应召去搞传教工作（一般不这样做），他那不熟练的本国语言将是最严重的布道障碍。缺乏准确的宗教词汇即使不像科学那样会出乱子，但是问题仍然是十分严重的。搞传教工作而缺乏读写的的能力，它所遭受的损失将比科学更大。一个中国的布道者，不管他的其他方面成就如何，只要本国语言不过关，他就不会成为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人。受了英语教育的人很自然地会把学好的英语看作经商的主要储备，希望借此能过好生活。由于自然的需要，终于为通商口岸所吸引过去，在外贸部门或外事单位寻找职位。处于这种地位的人，他在群众中影响好坏，是很少去考虑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种人道德品质之坏，往往触目皆是，他的一生不是为维护真理，恰恰是反对真理。反之，他接受了本国语言的教育，他仍然会同群众在一起，得以保存固有的道德品质，他会被人尊为最有才能和成就的人。他的意见和教导是打破迷信和偏见的力量。他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他活着的意义是为了中国社会的普遍进步。所有这些还不包括专门的布道福音工作在内。如果他应召从事布道工作（像他通常厂做的），他所受的教育会使他非常适合这项工作要求。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声望会博得蔑视宗教的人们的尊敬。每一事物都有它的内在联系，要使它完全脱离其自然联系，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学英语的人几乎都学会了如何追求优裕生活，享受荣华富贵，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沾染上了外国色彩，他们对家长的勤劳朴素的生活习惯不感兴趣。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同外国人打交道。由于他们学到了英语，赚了些钱，滋长着满足生活欲望的想法。接受本国语言教育的孩子就不一样，虽然他们学习了数学和西方科学，而且远远超过了他的同胞，可他的生活习惯和思想并不因物欲引诱而变了质。他仍能适应家庭的勤劳朴素生活。在他面前没有很快就捞到钱的机会，没有意识到在他未来生活中非继续与外国人接触不可。所有这些优点都是显而易见的，它使

青年人能同自己同胞苦乐与共，并在他们中保持良好影响。”<sup>①</sup>

可以看出，狄考文并非反对英语教学本身，他在1890年1月9日给哈珀博士的回信中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人如何既要使英语和自立成为学校的显著特征，又想办基督教大学，都将面临着困难的”。狄考文和赫士在1890年给一个基金会的报告里，说他们完全愿意引入英语，但只能在不严重改变学校特点和工作的条件下。<sup>②</sup>1891年2月9日，狄考文给一位差会总部干事的信里说：“我希望您能注意我们的英语计划的真正深意。即保证英语被用在文学和科学方面，我们不会取向任何人仅仅教授英语也不会教英语给任何只想学英语的人，我们会教给成年人不会教给孩子。……我们仍愿意推动，如已表明的那样引入一些英语。”<sup>③</sup>

提倡英语教学者提出不少具体理由，可这些理由在狄考文看来都不能成立，下面将分别分析：

1. 一个理由是那时西方科学术语还不容易以汉语表达。当时比较合适的中文教科书奇缺…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中文不适用于自然科学，只有西方语言才是从事高级科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sup>④</sup>1889年美部会的的 C. D. Tenny 和美以美会的 L. W. Pilcher 干脆说如果不用英语教学，科学教育被证明无法进行。<sup>⑤</sup>花之安(E. Faber)在1893年“中国基督教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第一届年会上发表《中国基督教教育面临的问题》的文章，认为“用汉语表述科学思想尚需几百年的时间，而且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人思想僵化，没有产生在思想中的东西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语言中；传教士要努力使英语成为东方的语言，教学完全的科学知识只能用英语”。<sup>⑥</sup>有传教士认为教会学校实施英语教学是“向中国灌输新思想的需要，只有中国人掌握了英语后才能了解西学的真谛”。作为一位曾亲身编写中文科学教材，一直以中文进行科学教学的教师，一位中文科学术语委员会主席成员，有着相当成功实践的狄考文自然不会认可这一理由。在接受中文科学术语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六年后，狄考

① [美]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见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② CWMP218

③ CWMP219-220

④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⑤ Irwin Hyatt,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70-1890: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 in kwang-ching liu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98

⑥ 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Z].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3. 转引自顾卫星、杨才元：《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与教会学校英语教学争论之比较研究》，《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5年9月第7卷第2期，第60页。

文说：“我搜集了大量的术语名单，科目有化学、物理、数学、天文学、地质学、冶金学、摄影、钟表制造、机械、印刷、音乐、精神和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神学等…他还作过一个关于化学术语的报告，推荐了一套新的、有明显中文特色的化学符号记法。…狄考文与朱丽娅的音乐书很有关联，尤其是在创定合适的术语上”<sup>①</sup>

2. 用汉语教学要通晓数种不同方言的问题<sup>②</sup>。当时（直到今天）确有南方各地方言差异大，北方各地方眼差异小，且北方话比南方话更接近官话，官话在北方也比南方更流行的现象。狄考文长期在山东生活可能对南方各地方言带来的困难不如在南方传教士了解体验得深切（文会馆的辩论会上要求一律用官话，如用文言或地方方言都要罚款）。不过狄考文曾到长江流域进行过语言考察。也许更重要的还是狄考文是发行量极广的《官话教程》的作者，《圣经》官话修订本委员会一度任过主席的委员，他不会认为汉语方言差异大到中国无法用汉语实现语言统一而只能用英语达到语言统一，就如一些英属殖民地那样。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狄考文在这两方面（准确翻译西方近代科学词汇、成为中国的统一语言）对汉语的信心（狄考文在《官话汇编》第一版的英文序言里说“官话最终要加以丰富、改良进步得到尊崇，不但是中国的口语，而且也要成为文学”<sup>③</sup>）是符合现实的。

3. 对传教士来说，用本国语言教学当更容易。杰西提到，虽然登州文会馆和潞河书院再次抵制，但是到 19 世纪末，许多大学除了中文课程以外都用英语作为教学用语。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就是本国语言（指英语——本论文作者）教学当然是更容易。<sup>④</sup>对狄考文来说这种畏难就易的办法是绝难允许的。事实上狄考文不仅本人对汉语官话的熟悉几乎同母语差不多，而且他准备了 25 年，出版后深受欢迎的《官话教程》就是外国人学汉语官话的一部教材。在准备过程中，狄考文寻求华北、华中有能力学者的帮助，学习口语和词语用法，同时准备一个汉字字音表。为了这一目的，狄考文广泛旅行。1889 年，在花了一个夏天研究中国的方言后，狄考文与朱丽娅到长江流域作了一次三个月的旅行。他们沿大运河南下，在运河上的时间有一个月，在南京住了一个月。旅行的主要

① CWMP160-161

② 德本康夫人：《金陵女子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年版，第 9 页。转引自顾卫星、杨才元：《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与教会学校英语教学争论之比较研究》，《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5 年 9 月第 7 卷第 2 期，第 60 页。

③ CWMP136

④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63 页。

目的是使自己了解当前人们使用的官话，以完善其著作。这次旅行使狄考文能够对著作作最后的修订。按他的观点：“不止双倍地增加了教程的价值”。紧随其后的成果是在朱丽娅的帮助下一本六百页的巨大的四开本著作。1901年，在艾达的协助下，狄考文出版了一本同样性质的更基础的著作。<sup>①</sup>他还计划编一本官话字典，1874年6月6日，狄考文在给古德里奇的信里说到他对这一作品的观念：“我对此书的想法是编一部华北口语字典，一方面，我们能搜集到的直隶、山东及一切官话地区人们的日常用语，另一方面不包括仅是地方性的词语、短语，而且，作为一个显著特征，字典要收录各种现成的习语和由两字或更多字组成后有了不同意义的词。”这本狄考文最终未完成的整本都是中文的巨大字典，占了一立方英尺多的地方。1900年，作为这一项目和同类研究的成果，狄考文发表了对2118个汉字的分析的一本书。这本小书是想帮作听写练习的孩子学汉语，现在（1911年）仍为许多教会学校这样使用。<sup>②</sup>

他讨论“God”中文译名的书1902年出版，书里有对中国文献的大量征引。他出版了一本中文赞美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尤其是在主日，当他不布道时，他就不时地新作一首中文赞美诗。事实上，当他听到一首特别感动他的新赞美诗时，他就希望把它翻译过来以丰富中文赞美诗集。<sup>③</sup>狄考文在上海印刷所期间，还做了一种新式样汉字字模分格盘。1902年1月，狄考文在一篇《传教士和语言》的论文里说，当我听到一位年轻的传教士来这儿几个周或几个月后说，我讨厌这门的语言，谁能学会这样的语言，我对他能否胜任工作的印象就大打折扣。狄考文认为每个人都能完全学好一门外语，而非粗通一二。<sup>④</sup>

4. 1881年一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B.C.亨利在《教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说，新一代无私、有公共精神的知识分子正在中国兴起，可以被信任不会用英语为个人谋利。<sup>⑤</sup>事实证明像亨利的这种估计过于乐观了。

5. 广州岭南大学的香便士曾指出：既然中国人希望学习英语和西方科学，那么传教士应该确保他们只能在教会学校里获得这些知识。<sup>⑥</sup>狄考文在论证要在教会学校开设科学课用的也是这个逻辑。不过区别是，在狄考文看来，可以容

---

① CWMP169-170

② CWMP165-166

③ CWMP161

④ CWMp105~106

⑤ Irwin Hyatt,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70-1890: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 in Kwang-ching Liu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97

⑥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忍自己的学校培养出不信教的拥有科学知识的人，但不能容忍培养出不信教的买办，因为前者在客观上可能有益于中国基督化，而后者不可能。

6. 有些传教士说学校开设了英语课就可以吸引上层人士的子女，从而保证教会可以得到有影响的教徒，或者至少消除反对一切外国事物的偏见。<sup>①</sup>狄考文虽早就很重视培养“有影响的教徒”，但他似乎只看重通过学生本身知识结构的完备来发挥影响，保守地对这种捷径没有给以重视。在文会馆升为大学时，狄考文样表达了他对此问题的信念：“如果我们教英语，就此寻求官员和富人的庇护，无疑我们能得到一些帮助和支持。可是我们将被迫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学校显著的宗教性，我们将有不同于现在的学生，尽管我们还在，学校的宗教色彩会很快改变。另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学校的中国学术水准会下降。学习英文对高水准地掌握中文经典来说是个致命影响。在学生学会英文后，我们无疑很难留住他们，他们会马上寻求能给他们带来优厚薪水的工作。而且登州作为一个偏僻的内陆城市（原文如此）并非很多外国人居住的港口，不是一个以英语教学为显著特征的学校所处的好地方。”<sup>②</sup>

7. 1886年一位美以美会传教士 C. F. 古波非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认为传教士应该确保教授足够的英语、科学和其他有争议的科目以使学生在现实职业上有竞争力；认为期待每个学生从事全职宗教工作是个严重错误<sup>③</sup>。狄考文并非期待每个学生将来都从事全职宗教工作，这可以从他对第一届毕业生的建议看出。

在当时确实是注重英语教学的学校获得了更快发展，学生也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可以说狄考文高估了中国社会的清高。狄考文在1896年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会”第一届年会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不是无条件地反对英语教学。我赞成英语教学带来的好处。在某些情况下我绝不反对英语教学”<sup>④</sup>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上海圣约翰大学，1881年开始招收英语学生，1894年开始用英语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其学生家庭出身背景越来越好，到1901年，学生大约有一半是商人子弟，其次是学者或自由职业者的子弟，农民或牧师的子弟为数极少。不过，对于圣约翰的学生虽然英语流利，但不谙本国语言的毛病，社

①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② CWMP216

③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157页。

④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Z]-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82. 转引自顾卫星、杨才元：《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与教会学校英语教学争论之比较研究》，《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5年9月第7卷第2期，第61页。

会早有非议，不少校友也强烈要求改进。<sup>①</sup>但是山东基督教大学（这所学校把文会馆视为自己的前身）似乎一直是农村基督徒家庭子弟的教育中心，汉语几乎是唯一的教学用语。它对希望学英文的商人子弟毫无吸引力。学校的学费很低，学生中教徒比例很高。齐鲁大学是培养社会和宗教工作者的主要中心——四分之一的毕业生选择这一职业。该校的优势地位与他强调学校的基督教目的和强调用汉语而不是用英语作为教育手段有关。<sup>②</sup>从这个对比可以说狄考文保守，但怕不能说比主张英文教学者落后。

1906年，广文学校学生罢课，声称在学校满足其九项要求前不上课。要求之一就是开设英语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罢课导致了赞成开英语课的柏尔根校长的辞职，一贯反对开英语课的狄考文暂代校长一职。在1907年12月19日的一封信里，狄考文说：“我强烈支持一所英语学校，最好是在济南府，但我反对在这所学校里设英语课，那会很快破坏现在维持的高水平的学校，把学校的所有毕业生引向世俗方面的工作。”狄考文的担心是如果学校引入英语，毕业生就会由从事牧师工作福音化人们转为商业追求，学校就会变成买办职员训练学校。<sup>③</sup>1907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经校董会通过于1908年增设英语课，但附带一系列严格条件：①每日一节，每周五节，只供正科三年级以上学生选修；②学生选修英语后，各门功课成绩如不能维持在八十分以上，即不准继续学习；③每年要增交学费三十元（即比其他同学多交了50%的学费）。有了这些清规戒律，1909年在校二百四十六名学生中只有十六人选习了英语课。可见在广文时代的课程里，基本上是没有英语课的，这在教会大学里也是绝无仅有的。<sup>④</sup>

值得指出的是1903年清政府已正式颁布“癸卯学制”，从1904年起在全国实施“癸卯学制”。该学制规定在通商口岸城市的小学堂，如果出于谋生的需要，在高等小学可于学堂课程时刻之外兼教洋文，应就各处情形斟酌办理；中学堂以上之学堂，则必全勤习洋文，有条件的中学堂可以用英语教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以此作为向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英语教学的过渡，高等及以上之学堂，除伦理、经学、诸子和词章等中学外，其余科目均用英语肄习。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清朝最后十年的新政的一个特点就是脱离实际的冒进。一项实践落后于其规定，并不意味着这项实践落后于客观实际的要求。

①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②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页。

③ CWMP230

④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辑，第120页。

### 3.1.4 宗教

作为一家教会学校，宗教内容自不容忽视。平时“学生们早晨六点到教室，学习到八点，然后都到一间大教室里祈祷”<sup>①</sup>。学生们半天学习基督教和科学，他们学习教义问答手册，旧约历史，《天路历程》，《基督的见证》，记忆圣经中的一些部分。<sup>②</sup>文会馆的星期日安排是这样的：晨祷会，接着是读经班，然后是11点的礼拜，下午是主日学校，晚上检查学生对当日上午的讲道掌握了多少。<sup>③</sup>在登州和杭州学生被要求背诵整个章节甚至整本中文版的圣经。<sup>④</sup>传记中提到“尽管狄考文和那些把学校仅看成学生皈依基督的有效机构的传教士观点不同，他还是把这当成学校应追求和期待的主要结果之一，大约学校成立两年后，他有了为一名学生洗礼入教的巨大喜悦。”<sup>⑤</sup>“狄考文…全心信奉，并努力让学生留下印象的一件事是：一个基督徒所能从事的最高尚的工作是传布福音。在学校运行中，狄考文的主导愿望是培养有忠诚信仰、有能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心中充满圣灵，作为为上帝赢得中国的基督的大使。”<sup>⑥</sup>“那些在这儿呆得足够长时间以被学校影响塑造的，和足够成熟的，都公开正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们被培养过正直神性的基督徒生活。”<sup>⑦</sup>和其他新教传教士一样，狄考文接受教徒是非常审慎的。“第二年，又有三个最大的学生入了教，另两个人在考察后被认为最好再等几周。还有许多希望入教，但被建议延缓一下。这样，皈依基督的学生逐渐增加，到学正式成为大学时，所有已毕业的和几乎所有充分成熟的在册学生，都正式加入基督教了。”<sup>⑧</sup>

杰西·卢茨提到“为了学习西方语言和数学而不得不服从基督教，中国人一般认为这个代价太大了。在他们看来，传教士提供西学只不过是一种诱饵，目的是为传教获得听众。这样一来，中国人的敌对情绪…有时阻碍了对教会学校作用的承认，或使教会学校的影响成为一种消极的作用。”<sup>⑨</sup>王立新也提到教会学校使中国人由憎西教转为憎西学。这些问题可能存在。对于全国的一般情况，本篇论文在这里无法评价。对于文会馆的宗教课，如本论文第一章所述“80年

---

① CWMP138

② CWMP138

③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④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⑤ CWMP142

⑥ CWMP148

⑦ CWMP149

⑧ CWMP143

⑨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代……在文会馆的 56 门课程中，神学仅占 6 门。”<sup>①</sup>（当然，神学课的课时比例比门数比例要高——论文作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虽然“教会学校充斥着宗教气氛，一些学生信仰了基督教，不过宗教信仰与人的社会倾向并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sup>②</sup>

### 3.1.5 学生课外活动

狄考文在文会馆很重视学生辩论会。1886 年（当时才有十一名学生）狄考文就组织了一个叫做“螭藻”的辩论会，到了文会馆时代学生人数增多，则分为“高谈、阔论、育才”三级。<sup>③</sup>《文会馆志》上说这是“学生共和国之实验场”。会议程序完全是仿照美国国会的程序。辩论会总纲第一条为“本会以交换知识、练习口辩、造就共和国民资格为宗旨，因取名辩论会，一名学生共和会”<sup>④</sup>。我们应注意这是仍是大清帝国时代。

总纲第十三条规定“凡论说纯用官话，不得夹用文言文或土话”<sup>⑤</sup>。规条第二十九条甚至规定“凡演论有用文言或土话者罚金二十文”<sup>⑥</sup>。

“我们在这一场合举行了一次交流，毕业生的演说非常好，对学校的整体作用是非常令人开心的。学生明显地看到了他们面前的确定目标，他们被激发起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雄心。”<sup>⑦</sup>从狄考文的这段话看，文会馆曾有过学生毕业演说。

除辩论会，文会馆在 19 世纪末期以前，还有另外一些学生课外活动团体。如传道会（创设于 1876 年）、勉励会（创设于 1883 年）、戒烟酒会（创设于 1886 年）、赞扬福音会（创设于 1886 年）、青年会（创设于 1895 年）、新闻会（创设于 1895 年）、中国自立学塾会（创设于 1898 年）。<sup>⑧</sup>在登州时，狄考文就一直很看重文学社团的价值，这些社团现在（在潍坊狄考文再任监督时）有了新动力。<sup>⑨</sup>

可以看出，这些课外活动，一方面作为从美国移植来的事物，相对于古老

①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00 页。

②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01 页。

③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 辑，第 116 页。

④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 1913 年印刷，第 61 页。

⑤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 1913 年印刷，第 63 页。

⑥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 1913 年印刷，第 66 页。

⑦ CWMP144

⑧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36 页。

⑨ CWMP229

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新奇的，一方面也可看作中国维新大潮中的浪花。

### 3.2 学校对社会的影响

作为山东省一所最早的高级洋学堂，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sup>①</sup>，文会馆对社会有多方面影响。

#### 3.2.1 直接影响——培养毕业生

文会馆和其他早期创办的教会学校，培养了近代中国除了留学生外最早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sup>②</sup>毕业生有着很好的出路。“超出应届毕业生数量的远不止局限在山东的很重要的职位等着他们去填补，”<sup>③</sup>在青岛举行的狄考文葬礼上的一个显著事件是宣读文会馆毕业生包括随校迁至潍县的统计。经过仔细修订的数据如下：总共 205 人拿到文凭；官办学校教师 38 人；教会学校教师 68 人；牧师 17 人；福音布道者 16 人；文字工作 10 人；经商 9 人；医生 7 人；邮政 4 人；铁路 2 人；基督教青年会 2 人；海关 1 人；商业职员 2 人，秘书 1 人；在家 6 人；去世 22 人。这些毕业生分散于 13 个教派，100 所学校，16 个省。大约有两百多文会馆学生没完成学习课程。<sup>④</sup>

##### 1. 新式教师

19 世纪末期以前，教会学校是中国唯一培养西学教师的机构。<sup>⑤</sup>狄考文在 1877 年的报告里说：“毕业生们都有卓越的天赋。在本国语言文学和西方科学方面，他们都真正很好的学者。一个毕业生到杭州去负责那儿的一所教会学校，在我们学校成立二十年前就兴盛一时了。另一个去了芝罘，在一所苏格兰长老会所办的学校里任教。第三个去协助倪维思博士的广泛的乡村工作，我确信他会在那儿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去年曾在这儿任教的一个以前的学生也以同样的方式去协助倪维思博士工作了，他这样做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知道这样工作更苦而报酬反少。我们料想明年会有大量新生。急切想来的人数超出了我们的接收能力，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sup>⑥</sup>

登州文会馆坚持用中国语言进行教育，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有资格走上高

①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珠海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1 页。

②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01 页。

③ CWMP149

④ CWMP232

⑤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98 页。

⑥ CWM P145

等学府讲堂的能够用中国语言讲授自然科学的教师。文会馆办学 40 年，培养出的正式毕业生仅 200 余人，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对山东乃至全国的新式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 20 世纪初的清末教育改革期间，各地大量创办新式学堂，急需大批掌握西方新知识的教师。由于文会馆毕业生既有扎实的中文基础，又有较为广博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因而大受青睐。据 1910 年对 180 名文会馆毕业生的调查，在各类学校任教的 105 人，占 58.3%。这些人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也传播了新的教育教学方法。<sup>①</sup>当 1881 年登州第三届大学生毕业时，该校留下了一批学生当教师，并开始为其他教会学校提供中文、数学和科学教师。<sup>②</sup>

国立教育兴起之际，以文会馆为代表的山东的教会学校已有半个世纪，也算是清帝国最完整的教会教育体系之一。新办的学校首先需要新式的人才，这种人才自然不会出在传统的私塾中。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作为罕见的了解西学的知识分子，一时成了热门人才，全国各地的学校都争相聘请。不仅本省的山东大学堂，就连北京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江南大学堂、天津北洋师范、云南法政学堂、云南农业学堂、奉天陆军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都有文会馆的学生任职。那些在国家学堂任教者分布到全国各省（只有贵州没有）。这些毕业生西学程度确实不低，如一八九八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带了刘永锡、仲伟仪、于志圣、王长庆、綦鸿奎、连英煌、朱葆琛等八位文会馆毕业生去京师大学堂担任西学教习（员），每日一节课，每月薪俸三十两银子，比起他们在教会工作每月只有五至八串大钱的工资，有天渊之别，大大提高了文会馆毕业生的身价。一九零二年赫士带了刘永锡、张丰年、王振祥、刘玉峰、王执中、王锡恩等六人到济南协助创办山东大学堂（校址即今杆石桥实验中学）。<sup>③</sup>一时盛况空前，王元德后来说：“当庚子之难，国家受绝大创痛，乃遍设学校，谆谆以培养人才为急务，而教授科学却无甚人选。则东明（狄考文之字——著者）高足，脱颖而出，咸应聘于各高等学校，以分司教铎，执牛耳焉。”<sup>④</sup>对此，狄考文是乐观其成的。他曾劝首批的三位毕业生中愿意立即去传教的学生先去作教师。在 1877 年传教士大会上，他的发言中说“从事教学或其他职业的学生，

① 张美：《登州文会馆与山东教育近代化》，《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 年，第 26 卷第 3 期，第 105-106 页。

② [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57 页。

③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 辑，第 113 页。

④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02-203 页。

他的良好的影响可以与成为宣教师的人相媲美”。<sup>①</sup>

## 2. 当地近代实业家

利维在说明大部分现代中国实业家是在国外或中国的西式学校受教育这一看法时提出了一种解释，传统的中国社会和教育强调孝顺父母，拥有土地，效忠国家，却没有提出一种有助于持续地迅速发展工业的组织结构或价值体系。利维的结论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肯定比受中国传统影响的人更有条件成为杰出的现代实业家。因为西方教育强调竞争，强调通过自己努力赢得地位，而且它的价值观也和中国传统格格不入。<sup>②</sup>

一个例子是刘寿山，他幼年丧父，母亲为人帮佣。刘毕业于文会馆，先任文会馆教师，又任教会执事，后自己经营花边业和房地产业，成为大资本家，捐助教会数十万巨资。<sup>③</sup>当然由于资料所限，本论文作者无法统计近代烟潍地区实业家中出身文会馆的比例。

## 3. 道德楷模

文会馆的学生出学后颇能治身自好，过着清教徒的严谨的生活，<sup>④</sup>这些文会馆的毕业生在社会生活树立了新的形象，他们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纳妾，在宗教精神的约束下，洁身自好，给社会一班人很好的示范作用。<sup>⑤</sup>

### 3.2.2 学校对社会的间接影响

#### 1. 对山东省及全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陈腐的教育体制窒息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勃勃生机。传教士最先站到了近代教育事业的起跑线上。教会学校的创办改变了这种一潭死水的状况，它第一次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新信息，使多少年来埋首于故纸堆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四书五经之外的广阔天地，激发起他们探求新知的强烈愿望。<sup>⑥</sup>在近代中国，“西学所挣得的一席地位，传教士是有功劳的。”<sup>⑦</sup>

就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而言，教会学校首先把欧美的先进教育方式输入中国，其新的课程设置，高效率的管理体制，冲荡了日趋衰败的学塾书院制度，成为

① 朱有璘、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② [美]利维与施国恒：《现代中国商业阶级的兴起》，纽约，1949年版，第13页。转引自[美]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80页。

③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④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辑

⑤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⑥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⑦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过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旧教育的最早历史否定物。<sup>①</sup>青年袁世凯驻扎在登州时，曾参观过文会馆，与狄考文、赫士等私交甚密。<sup>②</sup>据有人对山东大学堂与登州文会馆的正斋西学课程统计比较，两学校雷同的课程竟达 12 种之多。<sup>③</sup>山东率全国之先建起山东大学堂。此后，清末教育改革得以在山东顺利进行，不到 10 年的时间，近代教育体制的框架就得以在山东基本建立，说明人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已经发生变化。变化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登州文会馆作为一所存在 40 年，采用西方教育观念、教学设施、教学方法的教会学校无疑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sup>④</sup>

文会馆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另一项重要影响是“编印课本，各地书院争相采用”<sup>⑤</sup>。直到狄考文出版他的算术课本，引入阿拉伯数字前，中国算术是采用中文数字的。狄考文采用中国传统的写法，所编的《心算初学》和《笔算数学》（分上中下三册）二书的习题都是汉字竖排出版。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的新时代的黎明里，为教会学校之外的中国师生所几乎需要的第一本书就是一部西式算术，充斥市场的是许多狄考文课本的盗版本，以木版印在便宜的纸上。这些出版者还不知道“版权”的意义。这本书的流通，不管是怎么带来的，至少立即增加了其作者在教会之外的学术阶层中的声誉。上海印刷所正规发行的版本卖出了几万册。费驰先生写到：“不可能列出该书销售量的实际总数，该书已走入帝国的各个地方。”<sup>⑥</sup>1882 年，狄考文向教科书委员会报告说代数已写成手稿，只需一些修正和重新安排就可付印，几何之后代数第一册也出版了。这两本的销量也很大，尽管因为更少的人学习这一分支，不能与算术书的销量一样多。1885 年，狄考文的几何课本出版。1908 年 1 月 14 日，狄考文把代数第二册的前言送给印刷所的经理。<sup>⑦</sup>

狄妻教音乐也遇到类似的符号使用的困难，当时西方只有五线谱，还没有用“1, 2, 3……”代表音阶高低的简谱，狄妻乃用三角、半圆、菱形、圆形等代替音阶。过了一段时间，编了一本《乐理启蒙》，书末附有几首基督教常用的

①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1 页。

②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95 页。

③ 张美：《登州文会馆与山东教育近代化》，《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 年，第 26 卷第 3 期，第 105 页。

④ 张美：《登州文会馆与山东教育近代化》，《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 年，第 26 卷第 3 期，第 106 页。

⑤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 辑，第 110 页。

⑥ CWMP163

⑦ CWMP164



赞美诗，供学生欣赏唱颂，既学了音乐又传了宗教。<sup>①</sup>

文会馆时期的讲义以后出版问世的，除上述《笔算数学》、《乐理启蒙》等书外，还有狄考文编的：《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几何）、《振兴实学记》，也有未经出版仅由“生徒传抄学习”的如《理化实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微积习题》等。继狄考文任监督（校长）的赫士编有《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是非学体要》（逻辑）。从这些书名也就可以看到文会馆理科课程的基本内容。这些书虽然都有西方原著为蓝本，但颇能结合中国的实际，使人易于接受。在缺乏新课本的时期，各地书院多乐于采用作教科书，各校教员也用来做为教学的参考。后来文会馆的毕业生如张松溪（子清，一八七一至一九六五）著有《勾股题镜》、《八线备旨》（三角）；刘光照（子耀）也编译有好几本代数、几何课本，比狄考文所编的还要详尽，且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销路也较广，但仍无法埋没狄考文的启蒙作用。<sup>②</sup>

## 2. 对中国人接受西学的影响

文会馆使得生活在古老的登州府的人们，第一次看到点灯不用油的西洋奇事，并仰观天上星宿的宏伟景象。1896年完工的文会馆新建的房屋装有暖气和电灯，联想到蓬莱农村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有电灯，21世纪初才有暖气，这在当时确实开了当地人们的眼界。学校的供热照明系统等远不止是帮助改善工作的便利，其自身也是在向学生和所有人不断展示自然科学的原理及其在实际生活事务中的价值。<sup>③</sup>学校迁到潍坊后，除了暖气、电灯，狄考文还设计安装了一个风车、水泵、水箱，用管子给学校和几处住房供水。<sup>④</sup>

“在登州科考时，很多已听说过外国机械名声的士子过来看看，狄考文就在士子们有空时把时间花在他们身上。这被证明是一个好机会，后来为此专门辟了一块场地，这场地也在中国春节时使用，在《官话教程》带来利润后，狄考文以之建了一座面街的大博物馆，博物馆的一半是一个大听众室，可以作电影放映展示。对参观者来说内室充满奇观，这里是一个人用一只手转动一个小曲柄，磨的谷物和一位妇女或一头驴花多得多的力气在石磨上磨得一样快。那里是装鸟的盒子，墙上是奇异动物的图画，这里是一个人转动一个大曲柄，以

①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辑，第111页。

②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辑，第112页。

③ CWMP244

④ CWMP227

一种神秘的方式使上面的一个小铁车先喷出火花，然在一个环形铁路上绕室奔驰。”参观结束时，瞳孔放圆的人群由另一个门出去，而汽笛发出信号表明该一组进去“开开眼”的时候了。<sup>①</sup>

### 3. 对当地工商业的间接影响

王神荫回忆在前广智院所遗留下来的破旧书堆里，发现有六大本狄考文亲笔写的信件副本，内中一大部分是他向国外商家的订货单，有的订货单多至十几张纸连续在一起。由这些定单可以看出狄考文经售的商品，真是品类繁多，数量庞大，大至电磨机、纺纱机、织布机、棉花染了以后的烘干机等；小至办公用品、文具纸张、大头针等。<sup>②</sup>费什在传记里也提到随着登州学校的成长，他不仅要给自己家庭和工作提供物品，还要提供给别人，作他们的代理。定单有时要发到上海，但更多地是发到伦敦，纽约或是美国内地的一些地方。因为所列物品的特性和范围——从蒸汽机、望远镜、昂贵的化学物品，到图钉，许多定单很新奇。有些定单的复印单多达十页。以上。<sup>③</sup>经狄考文之手，烟潍当地人民得以很早就用上这些当时在中国还很罕见的现代机械，无疑对当地近代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狄考文在 1886 年给他兄弟威廉的一封信里说：“为修复仪器和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物件，我完全用自己的花费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工作室。我在这间工作室的工具上，材料上投入了一千美元，我自己出资请了一位工友，我对他进行了培训使他能做大多数普通工作，”<sup>④</sup>只要可行，狄考文就把实际机械操作交给中国工友——一位熟练的工头和他指导下的学徒们。<sup>⑤</sup>王神荫也提到，狄考文在找匠人依式仿造一些实验仪器过程中也培训了几个掌握机器的技术人员，其中有位丁玉璜学到了不少机器知识，后来到济南开设制造理化器械所，济南市遇有进口机器都来向他请教。该产品曾于 1910 年送往南洋劝业会展览，“咸称全国第一家”，狄考文也因此被誉为“近世之大制造家也”。解放后潍坊市柴油机与农业机械能以捷足先登，其基础与广文学堂的机械工厂不无关系。<sup>⑥</sup>狄考文的学徒很多出徒成为很好的铁匠、机械师和电工，不费力地找到相应职位。一位暂驻登州的中国将军雇了这当中的一位作铁匠，任务明显是用西式方法完

① CWMP245

②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辑，第114页。

③ CMWP 154

④ CWMP239

⑤ CWMP242

⑥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辑，第115页。

成的，这使将军到这位了不起的师傅的奇妙的店里去看了看。从狄考文那儿出去的一位电工工头在济南开了一家店。在山东大学堂的建立使这家店的前景看好时，中国官员因嫉妒竞争对手想方设法迫使他将店售出，而只留他作工头，据说这件事是狄考文在临终前一个心思。在这方面，狄考文通常感兴趣的是穷人，但在帮其他人推动有益社会的企业时他也不吝援手，一位富有的中国煤矿主的矿场浸水后，狄考文费心帮他弄到一台抽水泵。无论为富人还是穷人提供这方面的帮忙，他都不计自己的安适、名利，全力以赴。<sup>①</sup>

### 3.3 狄考文在华其他活动

按美国长老会全国大会的指令，中国长老会教会法院（synod）于1870年秋组成，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这家教会印刷所的条件在教会法院上被提出来，印刷所被教会法院转给了出席的外国传教士。狄考文制定了一项关于此工厂整个运营的计划，经全体同意，送国内总部；总部适时批准了该计划，并需要有一个人来负责这一机构。在多次寻求其他合适人选之后，并且在狄考文拒绝之后，这一职位仍落到狄考文身上。<sup>②</sup>直到1872年8月，狄考文才最终回到登州重新开始在那儿的工作。当狄考文离开时这一印刷机构，包括一个书刊部，一个工作车间，一处监督住处，工人（都是中国人）住处，一所这些工人的祈祷室和其他设备，已正规而平稳地运行了。

圣经官话修订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登州狄考文家里召开的。<sup>③</sup>1890年，狄考文给倪维思写信说：“我在会前从未提到我会在圣经翻译中扮演重要角色，我感到教育是我唯一应出人头地的领域。我从未像在这件事上面这样受上帝指引。我被选为官话本执委主席。我的《官话教程》无疑带我向前，使我为这项工作受了训练，就个人偏好来说，我并不愿意作翻译工作，我会很愿意拒绝掉，但考虑到当时环境，我只好接受，我感到能力的欠缺，尤其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上，你可以肯定我很不愿意放弃手头的教育和文字工作，”<sup>④</sup>

狄考文后来的日子主要花在圣经官话本修订上，但他并未忘情于教育事业。1901年2月26日，狄考文给总部写信说：“关于学校，我生命的主要部分

---

① CWMP248  
② CWM P152  
③ CWM P82  
④ CWMP257

已献身于登州文会馆的建设，当然，我对其未来有深深的兴趣，”<sup>①</sup>1904年12月21日，狄考文给一位朋友写信说：“学校现在已完全迁到潍县，大约有一百二十名学生。新楼比登州的好得多。我夫人和我与我弟弟乐播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我现在不教课，但如果离开学校，我会感到不舒服，我希望学校能有了不起的未来。”<sup>②</sup>狄考文在他70岁生日时发给“家中的亲人们”的一封信里说。“上帝已保佑我使我完成了我生命中主要意图中的几项，从孩提时，我就向往开明教育。我来中国后不久我就在很少的规模上开始了教育工作，但希望能办出一所作为向善力量的大学……”<sup>③</sup>他在1907年12月21日写给布朗干事的信说：“考虑到环境，我想最好是马上无条件地辞去校长和董事职务…我向你保证，在花了传教士生涯的主要部分为学校工作后，辞去与其一切联系是个不小的考验。事实上，这在几周里严重的影响着我的健康，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忍受紧张。”<sup>④</sup>

早在1877年狄考文就建议要统一教会学校教育并进行分工。他主张各个地区合作建立各类学校，而不要重复同类学校。

1896年，中国教育会曾成立一专门改革委员会，推举林乐知起草“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成就”，狄考文起草“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sup>⑤</sup>

1897年春，狄考文发表《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sup>⑥</sup>，提出中国因“贫而愚，故日形衰耗，痼疾不廖，败征屡见…民由愚而智，斯由贫而富，国自转弱为强…愈愚维何，莫先兴学”，<sup>⑦</sup>兴学有五利，并说朱熹也曾“谓时文无用，算法有用，欲兼他科目取人，又欲设学校教学者理会本分事业”。<sup>⑧</sup>狄考文认为“京都为天下宗仰，……故京都必先立一总学堂，以为通国之倡，乃可以号召直省……”<sup>⑨</sup>

狄考文的在华活动，综合来看，其主观动机是要将中国基督化，产生的客观效果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本论文作者并非基督徒，但从和狄考文本人有关

① CWMP222

② CWMP226-227

③ CWMP273、274

④ CWMP232

⑤ 史静寰：《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见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

⑥ 原文标注作者为“狄考文等”

⑦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⑧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⑨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的材料和一些其他传教士的材料来看，他确是认为基督化是一个地区人的最大幸福，或为其不可缺少的关键条件。基督教新教并没有天主教那样有以教皇为中心的严密组织体系，当然新教传教士也是其国内差会派来的，要服从国内差会的指令。本论文作者没有发现美国长老会差会曾给狄考文发布过和传教不相关的指令，也没发现美国政府有过类似指令。抱着将中国基督化的目的，狄考文在华进行的办学活动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其他如翻译圣经等活动至少没发现其对中国的明显害处。

## 主要参考文献

### 1. 史料部分

- [1] 狄考文:《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2] 狄考文:《续拟清京师创设总学堂议》见《万国公报》1897年6月101卷
- [3] 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1890年传教士大会记录,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 [4] 狄考文:《供中国使用的教科书》,见《教务杂志》第八卷(1877年),第427—431页。
- [5] 狄考文:《振兴学报论》1881年9月3日见三联《万国公报文选》
- [6] 狄考文:《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见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
- [7] 克劳福德夫人:《基督教差会在登州》,见《教务杂志》第八卷(1877年),第389—391页。
- [8] 《登州文会馆概览,1891年》
- [9]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印刷
- [10] 司弼尔:《长老会中国差会的报告》
- [11] 狄乐播:《朱莉娅传》(纽约,1912年版)
- [12] 《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9年第1期
- [13] 《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
- [14] 王神荫:《解放前基督教在山东所办中小学概况》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6版
- [15]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见《文史资料选辑》91辑

### 2. 研究论著

中文

- [16]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禁烟运动》,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78年版
- [17]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18] [美]费正清 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94年版
- [19] 《山东文史集萃·教育卷·宗教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20]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21]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22] [美] 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23]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 [24] 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25] 约翰·布克：《剑桥插图宗教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
- [26] 谭双泉：《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 [27]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 [28]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1年版
- [29]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30]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31]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 [32] 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33] 章开沅：《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34] 章开沅：《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35] 史静寰：《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36] 史静寰：《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37]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 [38]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39] 石玉新、杨晓波：《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 [40] [美] 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上）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 [41] [美] 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许季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 [42] 朱有骥、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43]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44] 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45]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 [46]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 [47] [美] 劳伦斯·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第二册），洪成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48] [美] 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 [49] 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 [5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过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 [51]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52] 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53]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54] 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英文

- [55]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11)
- [56] Charles Hodge Corn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 loo)*.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 [57]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29)
- [58] Graham, Gael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 1930*,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5)
- [59]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60] Hyatt Irwin, *Three 19<sup>th</sup> Century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61] Forsythe,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0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1971)
- [62]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_\_195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 [63] Forsyth,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 [64] Kwang-ching liu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65] Alice Henrietta 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06-1937*,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46)

### 3. 研究论文

- [66] 虞亚琴:《英文课程在晚清中国教会学校里的生存之争》,《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11期
- [67] 王全来、曹术存:《〈笔算教学〉内容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4年03期



- [68] 吴洪成:《近代中国教会中学课程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年02期
- [69] 吴洪成:《中国近代教会高等教育的历史审视》,《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05期
- [70] 汪朴:《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大事记》,《吉林艺术学院学报》,1995年03期
- [71] 余子侠:《晚清社会转型的教育需求与教会学校的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03期
- [72] 王宏凯:《清末“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史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03期
- [73] 仇华飞:《论英国早期汉学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01期
- [74] 丁柏传、郑瑞君:《近代中国教会学校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0年02期
- [75] 刘方仪:《近20年来海峡两岸教会教育研究综述》,《宗教学研究》,2004年02期
- [76] 杨齐福:《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福建论坛》,2004年11期
- [77] 杨齐福:《教会学校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0年01期
- [78] 刘海燕:《教会大学与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史硕士论文 2002年7月
- [79] 胡小君:《近代中国基督教中学研究》,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论文,2003年7月
- [80] 孙帅:《中国近现代教会大学办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史硕士论文,2003年7月
- [81] 傅琼:《论美国介入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程及影响》,江西师范大学中外关系史硕士论文,2003年7月
- [82] 曾钜生:《西方教会在华办学问题初探》,《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04期
- [83] 胡思庸:《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的格致学》,《近代史研究》,1985年06期
- [84] 里明:《明清教科书编辑述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06期
- [85] 邓洪波:《近代书院与中西文化交流》,《河北学刊》,1993年02期
- [86] 郑永福:《晚清近代自然科学的输入及其影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01期
- [87] 张美:《登州文会馆与山东教育近代化》,《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6卷第3期
- [88] 王神荫:《美国文化特务狄考文在山东的侵略罪行》,《山东省志资料》1962.4
- [89] 笔影:《揭露美帝教会对中国的侵略》,《人民日报》,1950.12.14
- [90] 魏子初:《美帝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侵略》,《光明日报》,1950.12.25

- [91] 《彻底割断基督教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人民日报》，1951. 4. 17 社论
- [92] 顾卫星、杨才元：《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与教会学校英语教学争论之比较研究》，《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5 年 9 月第 7 卷第 2 期
- [93] 史静寰：《教会学校与近代中国的师资培养》，《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5 年 1 期
- [94] 赵启重：《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 年 02 期
- [95] 龚淑林：《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 01 期
- [96] 李勇忠、李春华：《帝国主义对华的教育侵略与教会学校的二重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 01 期
- [97] 辛俊玲：《近代烟台教会学校述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 02 期
- [98] 张生祥、景晓萍：《晚清美国在华教会学校的发展及其评价》，《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 01 期
- [99] 顾卫星：《晚清传教士关于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争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 年 01 期
- [114] 顾莹惠：《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 02 期
- [115] 刘哲：《19 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对教会学校的反应》，《社会科学战线》，2002 年 02 期
- [116] 钟令彩：《齐鲁大学与近代山东教育》，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论文，2001 年 7 月

## 致 谢

感谢我的导师董士伟老师对我在学业上的指导、生活上的关怀；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其他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感谢人文学院教育所叶富贵老师的启发。

感谢历史系全体老师和同学们，使我在这样一个让人怀念的集体中度过研究生生活。

家乡蓬莱的赵树棠先生，曾在蓬莱史志办工作，慨然以其多方搜求装订成的珍贵史料《登州文会志》相赠，并提供其他史料线索，在此深表谢意。

感谢一直以来家人和朋友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签 名：\_\_\_\_\_日 期：\_\_\_\_\_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个人简历

胡凯基，男，汉族，1979年1月2日生，山东烟台（蓬莱）人。

1996年9月入烟台大学中文系学习，2000年7月获学士学位。

2004.9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师从董士伟老师。

### 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论文：《美国传教士的落后性商榷》（尚未发表）

译著：《狄考文传》（*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